

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

(一九三三年六月)

朱 德

“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这是苏联军事学校的一个标语，其意在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是从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产生出来的，确实有了不少的实践经验，可是因为环境关系，一般缺乏理论研究。在帝国主义指使、帮助国民党军阀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的大举进攻中，和帝国主义将直接与中国工农武装冲突的前夜，担任土地革命、民族解放、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伟大任务的红军，更须从实践和理论中来提高军事技能，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更要以身作则来提高军事技能。我现在想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来抓住军事理论的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

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比如说，遭遇战斗，就应迅速动作夺取先机之利；对防御之敌的进攻，就应有分出

^{*} 本文原载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的《红色战场汇刊》。

接敌、进攻和冲锋等段落的部署。“喝汤”和“啃骨”当然不是一样的动作。

二、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钳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如有人想处处顾全，平分兵力，结果到处没有力量，将演出东不成西不就甚或失败的结果。

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如有人运用战术专寻找敌人硬处打，则敌人软处也必成为硬处了。倘因此而不能争取战术的胜利，则战略的目的也就不容易达到。要知道，战斗的完全胜利，是由许多小的胜利总合起来的。如有人不去争取小的胜利，则大的胜利又将由何处积累起来？

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兵团和部队在遂行任务时要保持通信联络，以便共同实现其决心。如情况变迁而通信联络中断时，则应根据首长决心和实际情况机断专行，但不能了解为机断专行就是与首长决心背道而驰。

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但侦察情况只能得到相当的了解，特别在遭遇战斗中更欠明了的了解。指挥员不能因侦察而迟疑徘徊，放弃良机。故指挥员常到先头警戒部队中赶早侦察，以便迅速定下决心，下达命令而不误时。

六、在山地用几个平行纵队作战，因道路少而小，没有适

当的平行路，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特别是变换正面困难。劣势军在地对优势军作战，如能掌握上述特点，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如处在敌人几个纵队的夹击或包围地位，要突击其中某一纵队时，则应求得内弧幅员较宽，周旋容易，并利用险要地形钳制另一方面的纵队；否则应突击某一纵队之暴露翼侧和后方为有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 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今年的“八一”，正是帝国主义新的强盗战争及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极度紧张的时候，正是日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中国国民党公开出卖东三省、热河与华北的时候，同时是全国反帝反国民党运动极大的高涨，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得到空前伟大胜利的时候，因此今年的“八一”有着非常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为决议如下：

(一) 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二) 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

(三) 在区苏土地部与乡苏之下，组织红军公田管理委员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红色中华》。

会，管理红军公田的生产收获及收获品保管等事宜。在区苏土地部与内务部的共同管辖下及在乡苏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一卷刊印。

朱德、周恩来关于红一方面军 东方军入福建后的行动部署 给项英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项主席：

1. 在博生已说好，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打击敌人增援队，不采取积极进攻清城办法。已电告彭、滕^{〔1〕}即本此急以攻泉上部队分一部乘胜袭击归化（只敌一营，无坚固工事），断敌右后方，配合主力断嵩口联络，易威胁清敌，调敌增援队，或改攻清流。

2. 在敌未动之先，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猛进是不妥的。目前多雨，山水时涨，十九师过将乐河亦与本原意不合，且难于开展邵大^{〔2〕}局面。

3. 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员。请你们决定部队行动时稍稍顾及此点。

朱 周
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 〔1〕指彭德怀、滕代远。
- 〔2〕可能是邵光，即福建省邵武、光泽。

周恩来关于实行新作战计划 必须有步骤给秦邦宪、 项英、刘伯承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秦、项、刘三同志：

一、实行上海计划^[1]第一阶段，目的在尽可能求得运动战中消灭卢^[2]部与增援之十九路军，但在战略实行上必须有步骤，且须以极坚决的信心与一贯的路线赴之。

二、我们指示东方军的战略方针已累电报军委主席，是估量到各方可能变化的敌情，给彭、滕^[3]以全般意图的指示，并指出现在向沙县行动是不适当的，十日十一时半的电告尤为明显。

三、我意如果敌情不出意外变化，行动步骤不宜扰乱，机动亦须与正在执行的战场方针相合。目前，三军团不断获得胜利，即由于我们依一贯方针，步步实施，而敌人处于被动步骤。在这里，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4]，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是战斗中大忌。续一^[5]。

恩 来
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

〔2〕指卢兴邦。

〔3〕指彭德怀、滕代远。

〔4〕指周子昆、曾日三。

〔5〕这里指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朱德、周恩来关于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入福建后的行动部署给项英的电报。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改变 原作战计划的意见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

(一) 如我们所了解的，方面军的意思是仅仅接受第三阶段，完全取消了第一阶段，并很多的修改了第二阶段，这是大大的改变了原来计划的意思。在原来计划中第一与第二阶段是进入决定胜负第三阶段之初步条件，考虑到所指出困难，如赣东北的危急形势、敌对黎川和建宁的压迫以及我们所派去的军团在未抵清流区域以前所越过的山岭、路程等等，我们仍请你们估计到这些困难，是与下面所得到便利对立着的，即由我强有力的军队突然出现于直接受危险的区域的外面，以完全新的形势，威迫敌人，使他很难继续压迫黎川与建宁。关于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中，夺取堡垒的问题，我不仅没有提议，而且着重的反对，这样就在第一阶段中，唯一的企图是：在消灭从清流、归化、将乐向西进，到我苏区的敌人实力之先锋，或被派来的截断我东方军团与北方调来的别的军队。关于南京、广东、福建、广西共同联合反对我们的可能，甚至在五千万大借款等事实以后，我们仍然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恰恰相反，依照我们的判断，事变发展的途径，是西南的军队现已注意攻打我们，以便在将来与南京的战争中获得较好的地步。无论如何广东较大的积极行动，已经从现在起确实发生了。因此在清

流、宁化、归化区域，初步削弱福建的军队，以为我们开始向东北进攻之先的阻止步骤，正是第一阶段的意义。如若我们跳过这一阶段，我们就不能阻止从南方来的危险。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第一阶段不能在福建以外去进行，就是因为我们的力量的增长与获得战斗力事的迟缓，逼我们要走容易的道路与顾及到第三阶段。这一事实便是要使最后阶段依靠第一、第二阶段之成功，与当时我们新的力量所达到的程度。第一与第二阶段的意义，还在于假若在七八月苏区中部与南部的形势，被敌人弄的确实很危急的时候，我们有暂时转入西方，甚至回到南方面代替继续向北进攻。在第一阶段，这种被逼离开原来的计划，无论对于方面军红校或对于东方军团，都没有任何的可能。不过在那再若有紧急事变发生，我们的新的力量，就要而且必须准备好了来对付。以上便是我拥护原来计划的理由。

（二）但是如我们过去已经指出的这一计划，只能当作一个总的纲领。你们对这一计划的一切实际的与具体的步骤，根据你们对于条件更好了解，自然比我们从此地所能介绍的要更加适用。如果你们觉得原来计划中的第一阶段，不可能去实现，那末可修改如下：

（三）留着二十师、四十九师、六十一师、六十二师，不为东方军团所扰动。

（四）留着模范师与新十九军到南方以便牵制广东军队的前进，是初步的回答你们二十三号关于广东军队前进的电报。

（五）集中第三军团于石城、宁化、安远地区。我们想这一区要可以经过较少的困难，达到并留此军团于相当的指挥者之手。至于在宁化、安远，东方首先应该打击谁，我们意见介绍卢兴邦军队之一部为第一个监视。我们意见是越过宁化、泉上向将乐的总方向继续前进，不需要进攻将乐的

堡垒。从此向梅江即泰宁之东北区，将比直接从建宁、泰宁区域发动有更多的便利。因为从建宁、泰宁直接发动，只能击退敌人，但不能消灭他，而且这将阻碍我们在第二阶段之下预期得到胜利。

(六) 这一从南方而不是从西方来的军团，既已到达将乐、万安区域并与我十一军或其他可以任命执行此任务之军队的合作，从西北进入建宁、泰宁区域既已完成，那末在邵武、黎川之间未采取任何步骤以先，即应消灭敌新二旅五十六师、二十师、三十师与其他军队之一部分。

(七) 为着制止广东军队的迫切危险与十九路军在我们作战之初，或其后一时期，当我们在此行动的时候之可能的新危险，我们向你们提议：加强我十九军及二十三军，加上新的游击队，并在数量上加强他们到我们三月初所给你们们的电报中所说的程度。

(八) 在七八月开始新编部队的大部分，应准备着应付会昌、汀州、瑞金区域的军事急变，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供给你们们的食品。

(九) 方面军应在七月半以前，回到永丰、乐安区域去，以便我方面军正在进行计划中所述任务时，稳定敌人的注意力于西方。如果机会凑巧，能够消灭一两团以上的敌人，我们自然并不反对这样。

(十) 在计划的其他部分，你们似乎没有什么意见。因此，我们想最好从现在起就停止在这一问题上交换意见，并让你们立即开始工作，同时在你们与前方负责指挥的同志中间应用一切可能达到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是所至盼。

(十一) 南方形势的发展异常紧急的，需要在东方军团作战以外，进行独立的反对广东军阀。同时请立刻告诉我们南方

敌人军队驻扎地区，并详细的告诉我军的主力部队分布、供给与一切条件，以及我新编部队准备的程度，那时再议告我们的提议。

中 央 局

七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为全国大水灾 告中国劳苦群众书^{*}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

全国的劳苦群众们：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把中国弄得灾难遍地，苦海一般：民族受着空前的凌辱，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者各种侵略之下，过着极悲惨的殖民地奴隶生活；国民经济破产，工业倒闭，农村衰落，失业、贫困、饥饿、死亡网罗着每一个劳动者；二十余年来仍旧是军阀专擅，割据自雄，平时横征暴敛，战时为祸尤烈，兵灾所至，弄得赤地千里；复“天灾”流行，无岁幸免，水旱蝗雹，交相煎逼着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群众。民国二十年大水灾所受的创痛未复，老百姓的喘息未定，而今年自入夏以来，偏又是不断的阴雨，内地河流水势暴涨，终酿成巨灾。前年洪水泛滥的惨象又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复见于今日！

我们看看今年的灾象，就知道中国广大劳苦群众落到了怎样一个深深的陷阱：在河北，北运河暴涨，浸淹了沿河各地的禾稼，南运河同时告警，亦已决口成灾，永定河决口五处，淹没了良田三千余亩，宝坻溃决，把五百多个乡村都葬到洪水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四十八期。

里，大清河民堤决口，淹没了新城八县；陕西是连年旱魃为虐，已是哀鸿遍野，近渭河复泛滥成灾，更是火上加油；湖北被灾区域尤广，武汉三镇曾经成个泽国；湖南被灾之区达三十余县之多；其他如赣、皖、浙、川、黔亦纷纷报灾。淹没了的良田，浪涛带去了的财产，冲毁了的堤坝，丧命于洪水的民众，这一个伤心惨目的灾象，实较前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这一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一九三一年受灾最惨的沿长江各省特别是两湖，今又陷于洪水；（二）近来水势的增涨不仅限于长江；滚滚的黄河，亦正在澎湃汹涌着，冲毁堤坝，淹没农田，这就造成了全国大水灾的险象；（三）河北这次大遭战祸，春耕夏耘在一大部分土地上已被破坏，现又加上大水，灾民难民将成千累万而不堪其苦；（四）这一普遍全国的水灾，将是中国国民经济更形破产的有力因素，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将随巨波大浪以俱起，向着推翻中国民众的罪人与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大道前进。

劳苦群众们！

水灾并不是不能避免的天灾。这是由于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乱行搜括民财，只用来养兵“剿匪”，从事内争，不进行任何社会公益建设的结果。就是在名义上划作兴修水利的一点款子，不是被军阀官僚私吞，便移作“剿赤”的用度。长江一带的堤防工程，因受不住大水的冲击，即行溃决，不去设法巩固它；河身日高，一点也不进行疏通的工作，致水流甚缓，横溢成灾，黄河的淤沙，至今为祸，从不加以清导，而民众则一贫如洗，哪里还有力量筑得起千里长堤。国民党政府只知取之于民，并没有将一点半点用来为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束手以待灾祸之来，结果，民众捐出了自己的血汗，还要一次再次地

受灾受难。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国民众实无以自救，无以出于灾难的惨境！

目前水灾的形势非常险恶，灾区遍全国，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忙于“剿赤”，忙于卖国，不见拨下分文赈款来进行任何救济的工作，坐视成千成万的灾民死亡道途，流离失所。若云国库枯竭，偏有千百万的巨款拿来“剿赤”，无数的国帑耗费到购买杀人的武器。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向美国借了两万万之外，又进行向英国的五百万英镑大借款，皆美其名来“复兴农村”、“发展实业”，实则都是借来进行反革命的战争。宋子文已经在美国及意大利订购了许多架飞机、大炮、毒气、炸弹来准备轰炸脱离了灾难统治的苏区民众及“暴动”的灾民。前年大水时，国民党军阀以铁血手腕用机枪来扫射饥饿交迫的灾民，不许他们登陆，活活地淹死在滔天的洪水里。这是国民党禽兽们血洗农村，屠杀人民。不有群众的革命斗争，争取苏维埃的胜利，那就是永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宰割，死路一条！

劳苦群众们！

我们号召你们立即团结起来，进行英勇的斗争，组织群众自己防汛救灾的委员会，要政府立发预防金与救济金，要求将“剿赤”的军费与付给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债款全部移作防汛与救灾之用，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学着四川劳苦群众的榜样，组织民众抗捐军，不纳租，不完粮；要求各地政府机关立即成立灾民救济所，将此次棉麦大借款之全部拿来赈灾；组织抢粮吃大户的运动并开展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军警屠杀灾民，在各地组织水灾救援会来援助灾区的民众。

劳苦群众们！

遍踏国民党的中国，是无地不灾，只有苏维埃革命已经胜利了的苏区，虽在国民党屡次“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困难情形

之下，苏维埃政府仍用一切力量来防止和救济各种灾荒，来谋广大劳苦群众生活的改善。这证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中国劳苦群众解脱一切灾难的救星，是广大群众争取解放的灯塔！

劳苦群众们！

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更猛烈的扩大革命的战线，进行革命的斗争，因为只有从斗争中才能寻得出解脱一切灾难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央分局和全体同志们：

因为交通断绝，在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形，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给你们指示，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自从你们的代表××同志来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研究与检查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充分材料，使我们详细而具体的了解你们的情形。××同志只给了我们一个极一般的口头报告，而且有许多重要问题，他也完全不明白。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有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必要。

我们这封信是根据本年七月七日和××同志的谈话，以及去年十二月光华^{〔1〕}同志的书面报告写成的。因为材料不充分，有许多问题以及关于军事计划，我们还不能作具体的建议，在这一封信里我们打算把国际和国内情形，给一个简单的介绍，把你们在四次“围剿”中的错误与弱点加以自我批评。最后，依照你们现在的情形，指出几个迫切的任务来。希望你们接到这封信以后立即召集扩大会议来详细讨论，按照具体环境规定你们的具体工作和任务，同时把你们最近的情形尤其是敌我力量的对比、你们的军事计划、对敌人的策略以及肃反经过等等，给我们一个详细的报告，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具体的帮助

你们的工作。你们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与我们的交通关系和无线电的联系，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解决我们所应当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因素，仍旧是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的对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加深与尖锐化，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使社会主义地位已经在苏联完全确立了，而建立了为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之惊人的胜利，不仅使工农劳苦群众的幸福与文化水平日益增进，而且使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之经济独立性愈确立了。现在苏联已经开始执行第二个更伟大的五年计划，即为建设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铲除产生人剥削人的根源的五年计划。苏联在国际上的力量，他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革命影响，他是世界革命基础的意义，也大大的增加了。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我们看见相反的情形，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继续加深与更加尖锐化，工业的缩小已使工人阶级一半以上失业或半失业，农业危机使农民群众达到空前的破产与赤贫化。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阶级斗争日益剧烈，而革命的生长，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都同样高涨着。例如：西班牙在革命漩涡中，中国有革命形势的存在，德国革命危机的前提是加速的增长着，波兰革命危机日益接近，日本将进到革命危机的形势中等等。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使帝国主义列强间为找寻市场、原料、产地与投资范围而起的矛盾与冲突更加紧张，首先就是英美的对立，同时日美、德意、德法、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对立，都正在引到新的帝国主义大屠杀。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

开始。国际资产阶级企图牺牲苏联，来解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与拥护之下，资产阶级疯狂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最近日本积极准备掠夺中东路，武装白俄盗匪，以及在堪察加渔业区的种种挑衅，欧洲“四强公约”的签字（英法德意），英国技师在莫斯科进行反苏联的阴谋，及由此而起的英国对苏联断绝通商，德国代表在世界经济会议上公开提出苏联的某些地方应做德国殖民地，法国远征军之组织，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芬兰军队之狂热的准备，特别选择的法西斯蒂之巩固与活动以及继续不断的挑衅，中国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疯狂的反对与攻击苏联等等，表示出直接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正在笼罩着苏联的境土上。资产阶级专政各种形式的尖锐化，反动势力之加强，法西斯主义的生长，白色恐怖之加紧，凡此一切都是为准备巩固后方，以便进行帝国主义大战与武装干涉苏联。

去年九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估计了目前的国际形势，指出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已经终结，目前正处于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大的暴力冲突的过渡期，即走向战争与革命的过渡期。因此，十二次全会决定了共产国际及其各支的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反对资本进攻；（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统治；（三）反对逼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对苏联的干涉。

在中国，战争与革命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英法帝国主义直接拥护与战争之下，在国民党一贯不抵抗、投降、出卖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和准备进攻苏联，而在中国所进行的强盗战争，已经快到两年了。虽然现在国民党已经最无耻签订了“华北停战协定”与日满代表开了大连会议，承认了满洲国并承认满洲、热河及河北大部分土

地为满洲国领土，用一切手段镇压反日反帝斗争，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会停止对中国的进攻，而且由于国民党进一步的投降出卖，使日本强盗得了许多进攻中国的方便，而加紧对中国民众的掠夺与屠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调动大批军队与飞机、毒瓦斯去镇压日益兴起的满洲、热河等地的抗日义勇军，进攻察哈尔，以实现其所谓“满蒙政策”并准备并吞黄河流域的地方。其他帝国主义也积极准备与实行瓜分中国，如英国在西北的侵略，利用藏兵大举进攻西康；法国在西南积极活动，企图并吞云贵；美国在太平洋积极备战，与日本实行三年造舰计划的大竞赛，把五千万（合国币二万万万元）棉麦借款给南京政府，用种种方法企图占中国。最近南京政府积极进行所谓“国联的技术合作”，“开发中国”，建设江浙“模范省”，这实际上是列强共管中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正在疯狂的进行着。

随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激进而俱来的，便是中国各派军阀间的冲突与混战日益酝酿和爆发。如四川军阀战争日益扩大，将蔓延全川；南京与冯玉祥将在察哈尔之宣化实行开火；西南反蒋运动日益剧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军阀的冲突与战争，反映着各帝国主义利害冲突与瓜分中国的激烈，同时又是帮助与便利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

无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各派军阀间有怎样的矛盾，但是他们对于镇压中国民众的抗日反帝运动，反对中国革命，是一致的。正因为中国有革命形势的存在，正因为两个政权对立的尖锐，所以帝国主义、国民党拼命压迫中国革命运动，首先用全副力量去进攻红军与苏区，企图以此来挽救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血腥统治。自从国民党出卖了华北以后，得了

帝国主义的大批借款（美麦二万万元，英镑一万万元，现在南京与各派军阀又续进行法郎、马克等等的大借款）与各种杀人利器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来反对红军与苏区，屠杀广大的劳苦群众。现在蒋介石已经把大批的军队集中江西了，飞机、毒瓦斯已经大用特用了，三路“剿匪”总司令（南路陈济棠、左路蔡廷锴、右路何键）已经就职，积极准备与实行向中央苏区“总攻”了。其他如鄂军准备大规模的进攻鄂豫皖与徐源泉在施南就鄂西“剿匪”司令职，刘湘就四川“剿匪”总司令职。所有这些，都表示出国民党如何疯狂的进行反对红军与苏维埃的反革命战争了。

但是，无论帝国主义、国民党怎样压迫中国革命，无论反动势力如何猖狂，白色恐怖如何残酷，然而这不但不能消灭中国革命运动，甚至不能暂时阻止中国革命的往前发展。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与国民党六年来血腥统治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浩劫，使得最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日陷于饥饿、失业、疾疫、死亡的惨境。国民党以其一贯的投降出卖的政策在群众完全暴露了它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冲突与内讧，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加之革命运动的蓬勃生长，苏维埃在广大的地域获得胜利，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广大的范围上崩溃着。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红军伟大的胜利，苏维埃运动的扩大，工人斗争的发展，农民运动的高涨，反帝斗争的生长，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了一个事实。

在我们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在全国劳苦群众积极的拥护与同情之下，苏维埃运动已成为不可克服的力量。在四次“围剿”虽然湘鄂西受了失败，退出洪湖，鄂豫皖主力离开原有苏区，但是鄂豫皖的苏区仍旧保存了一大部土地。红二十五军与

二十八军的形成与扩大，游击战争的开展，使得敌人惶恐不安，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将能恢复与扩大鄂豫皖苏区。最近红四军在四川得了伟大的胜利，据报载已经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苍溪、阆中、仪陇等县，现在正开展积极进攻为苏维埃四川而斗争。中央苏区自从今年第一季消灭与击溃国民党进攻部队的主力，缴获三万多枪支等等的伟大胜利以后，继续不断的得了许多胜利，近日又复占了安远、泰宁，占领了丰城、清流、归化，在执行“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大大的加强与扩大了红军。现在正动员一切武装力量与劳苦群众为冲破国民党的新的“围剿”，争取苏维埃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满洲海龙一带游击战争的发展，红三十二军的成立，同时二十六、二十九军仍旧活动着。这证明苏维埃运动，普及于全国，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形势。

在白区，革命运动迅速的高涨与发展着。工人的罢工浪潮普遍于各地和一切企业中。去年一年，据官场的统计，罢工工人共一百一十万以上，此外还有十八次的失业工人斗争，参加人数约十三万人以上。本年罢工斗争继续发展着。尤其是在四月间各业开始“减工”（例如纱厂改为四日工或三日工，约减百分之二十三，现在还继续减少）以后，工人斗争愈加剧烈。如上海、天津、汉口、无锡等地的纱厂工人罢厂、上海英美烟三厂的同盟罢工、闸北丝厂的同盟罢工、太古轮船的同盟罢工，平安路一千二百余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举行反帝代表大会等等，都证明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的高涨与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反帝斗争不管国民党怎样残酷的镇压，仍旧是在生长。满洲的义勇军现在又积极活动着，与日本强盗及其傀儡血战肉搏。华北的劳苦群众、抗日义勇军，在我们党的影响与直接领导之下正在准备与进行反日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反对国民党的出卖。这个斗争的发展，将日益走上创造北方苏区的道路上。此外，农民、灾民、饥民等的抢粮、分粮、吃大户、抗捐、抗租、抗债，以至于游击战争，为土地的斗争，遍于全国。少数民族的斗争也正在发展，如新疆回民接二连三的反反对国民党及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广西苗民反对国民党的大暴动等等，就是最显明的事实。

这样一来，中国显然是处于战争和革命的环境中。由这个环境便产生我们党的如下的基本任务：“（一）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之独立与统一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二）发展并联合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三）为推翻国民党制度而斗争；（四）坚决的采取转变赤色工会成为群众组织，并夺取在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人的路线；（五）开展游击战争，在满洲要提出并进行成立农民委员会，抗捐抗税并拒绝政府的一切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组织选举的民众政府的口号；（六）普遍的宣传和解释苏维埃区域的成功，宣传中国工农民众与苏联兄弟联盟的口号”（国际十二次全会关于“国际情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的决议）。将近一年的事变证明了十二次全会给我们党的任务的正确。只有执行这些任务，才能使我们党领导革命到胜利上去。某个组织是否真正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栈，也就要看它是否执行上述的任务。

如果从上述的任务出发来检查湘鄂西党在最近一年来的工作，那末，我们不能不指出，湘鄂西党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中我们在湘鄂西的战线是被敌人冲破了；湘鄂西苏区旧有的根据地——洪湖苏区，已经敌人占据了；我们的红军被压而退出了原有的根据地，在这里，我们的力量都比以前大大的削弱了——总而言之，在四次“围剿”

中我们在湘鄂西的确是失败了。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在五月五日的信中你们以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因为“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少数，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党的警惕性，使这少数反革命分子能在急危的时候影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恐惧等分子，取得他们的声援，而支配广大的部分。当然改组派占据了重要的职位，起了莫大的破坏作用，但是他们所以能够占据重要职位，正因为我们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斗争不充分。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作反改组派的斗争，在群众中彻底揭破他们的阴谋与罪恶，及时肃清这些分子出领导机关，开除动摇分子的要职，说服被反革命分子与动摇分子所欺骗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那末改组派显然不能给我们这样大的坏处，如湘鄂西已经遭受了的一样。

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于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后面还要提到），而且使人不能正确的了解我们这次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我们在四次“围剿”中所犯的各种错误掩盖起来。我们认为湘鄂西苏区失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敌人力量占绝大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关于敌人力量在进攻湘鄂西时所占的优势，你们知道很清楚，无须证明。现在我们把湘鄂西党在四次“围剿”中所犯的几个重大的错误指出来，这些错误就是：

（一）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四次“围剿”中的任务，首先没有动员一切力量去冲破敌人对湘鄂西苏区的进攻。无论群众如何热烈的拥护红军（如送饭、送肉、送鱼、送草鞋等），但是我们没有尽量吸引群众去参加红军。参加红军的有许多不

是自愿的（如经过大会选举）以致有许多逃跑的现象，甚至党员群众也不愿参加红军，使红军没有扩大与加强。没有好好的发动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去帮助红军作战，游击队在许多情形之下，由于平日没有政治工作与脱离群众，在敌人进攻中（如在洪湖）完全失了作用。没有发动与领导一切群众斗争去配合红军的行动，有些地方（如天潜苏区）当群众勇敢与敌人作战，赶走毛匪时，而党内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便逃之夭夭，他们说：“群众如此积极，若他们反水起来，我们还能跑得出来吗？”至于白军中的工作，在白区中心城市的工作，几乎是忽视的，像武汉、沙市、新堤、岳州这些中心城市中没有进行工作，不去领导自发的群众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战胜数量上远胜我们的敌人，自然是不可能的。

（二）我们没有集中红军的主力去打击敌人，往往把我们的力量分散，使敌人更容易压迫我们。虽然在作战时对于牵制敌人，扰乱敌人后方，或打击敌人的援兵，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这些任务，可由游击队、地方武装去执行，而不应由红军主力分散去做。然而，正因为我们的游击队的薄弱和不起作用，使得红军孤军作战，有时甚至被人的游击战术所牵制与骚扰。

（三）只知依靠红四军，没有独立的行动。不在准备与发动自己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的“围剿”的基础上去与红四军取得联络和一致行动，而是事事依红四军为转移，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出洪湖，跟着红四军乱跑，转战千里。退出洪湖之后，企图渡过襄北，没有成功，又向东北，然后往西北，又不成功，则到河南，复至陕西，再到湖北，由湖北又到四川，最后又回襄河，只在本年正月才开始建立了现在的根据地。在这个长途行

军中弄得战士精疲力竭，丧失斗志与战斗力，有的遇敌人不抵抗乱跑，沿途抛弃枪械子弹，有的因为渡河无船，淹死水中，有的因为路途不熟被敌人截击（如在河南失了八百余枪支），诸如此类等等。自此以后，我们的红军主力受了莫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与其说是被人解决，不如说我们“自取其咎”。

（四）过分估计敌人的力量，首先把苏区内反革命派，看作是“了不起”的力量，结果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地方党部因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工作，放弃了反对“围剿”的群众工作。这样脱离群众，放弃反对“围剿”的任务而孤独进行的肃反，自然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由于上述的原因，使湘鄂西苏区在四次“围剿”中遭了失败。对于这个教训是湘鄂西每个同志所应当深切了解的。但是，据我们所有的材料，你们还是继续着上述的错误，因此造成你们现在许多极严重的现象。自从退出洪湖以后，在几乎一年的过程中，除了长途行军以及今年春天与敌人在鹤峰一带作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积极行动，没有利用一切可能去准备我们的力量，去打击敌人，扩大我们的地域与力量。红军没有扩大，地方武装异常薄弱，虽然当地群众大半是贫农热烈拥护红军。苏维埃的负责人不是选举而是指定的。对于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执行，对于发展生产，强固苏维埃的财政与经济基础等等工作，我们无从看见。对于地主豪绅的武装，采取自由主义，不去解除他们，让他们畏缩的逃到山中。对于群众的组织，异常忽视，首先是没有工会和雇农工会，甚至由于不相信群众，把许多群众组织都解散了。尤其是无理由的怀疑一切党员群众，把党和团完全解散，重新整理，定出了关门主义的党章（过去一人介绍的不要，要重新登记，须有二三个好的干部的介绍，才能成为党员），

这是莫大的错误，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现在陷于无党的状态。由于过分估计反革命派的力量，由于失败情绪的反映，认为“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这样你们不是反对钻入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这是何等错误的。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和训练非常缺乏，借口党校过去办得不好就不办了，党报和群众报也没有出版，不敢大胆的提拔新的积极的工农干部，规定不正确的提拔干部的手续（过去保卫局）。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现象，如不坚决纠正和克服这种现象，那末对于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莫大的威吓。

我们指出这些现象，不是把湘鄂西情形看作没有希望，使我们消极、悲观，绝对不是的。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消极不悲观，甚至在任何困难之下都相信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劳动群众会终究得到胜利，都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以布尔什维克的积极性、坚决性、稳定性、胜利的信心动员群众，来克服一切困难与障碍，打击一切失败情绪，悲观失望的情绪。何况现在湘鄂西又有顺利的条件，有许多可能去争取我们的胜利。虽然你们的根据地现在处于偏僻之地，我们的力量此以前大大的削弱了，但是中国革命形势之存在，各地苏区与红军的胜利与强大，首先是邻近你们的红四军的伟大胜利，钟荆游击队的活动，洪湖还有我们不少的力量，在你们内部的敌人力量之薄弱，你们占有数县的区域，保持了二军团一大部分的主力，得有十万群众直接的拥护与依靠，土地革命的胜利，肃反告一段落等等，给你们有种种为往前发展与争取更大的胜利的顺利条件，你们是大有可为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条

件，坚决的采取与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与策略，动员最广大的群众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现在正是你们扩大领土与增强力量的最好时机。

从对你们的现状之正确的估计中，我们认为你们必须执行如下的迫切任务：

（一）动员一切力量为巩固现在的根据地而斗争，立即纠正过去一切错误，抛弃旧的路线而采取努力准备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和扩大我们的领土的政策。我们不能把红军主力放在苏区不动或只是起了游击队的作用。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集中主力，去向敌人进攻。应当加强地方武装与游击队来巩固现在的苏区。我们提醒你们，目前回洪湖的企图，是过早的。长江附近的敌人在目前比你们强大多了，而且洪湖今年完全可能遭受极大的水灾。你们决定要向湖南发展，也是不适宜的，这里比现在的根据地更贫瘠，而且更难与其他苏区取得联络。我们应当向有利的方向扩大我们的领土。现在我们认为你们向川南发展比较有利。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在四川除了北部有苏区外，南方还有游击运动与巨大的农民运动。我们不想对你们用全副力量向这方面进军，但是，我们认为可向这方面扩大我们的领土。同时你们应当派人到旧苏区去恢复工作，去领导现在的力量及其斗争。

（二）尽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斗力。红二军团不但没有像其他红军那样扩大，而且数量上减少三四倍，这是事实。我们以为这不仅由于军事的因素，而大部分是由于我们政治的弱点。主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去参加红军，没有把武装队伍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没有广泛的武装农民，使成为游击队、地方武装，以已有的比较原始的武器武装起来，而是依靠枪支。如果红二军团要成为影响革命发展的真正的因

素，那末，必须大大的加强自己的力量，在坚决的解除豪绅地主武装，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中去获得武装，以广泛的宣传，实行红军的优待条例等等的方法，号召与动员群众加入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加强红军中与一切武装组织中的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我们必须保存红军英勇的革命传统，粉碎反革命分子，为保护与扩大苏维埃领土，保护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

（三）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苏维埃的选举，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吸引群众来做苏维埃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帮助与参加之下来改造苏维埃政府。我们绝对不允许那种减弱苏维埃政权的威信的“宣布苏维埃的罪恶”。苏维埃的威信必须提高，必须在吸引群众做苏维埃工作和引导他们来反对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中去提高起来。苏维埃应当坚决的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法令，首先是土地法、劳动法。采取一切办法去提高与扩大苏区内的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不能因为反革命派拿食大米做欺骗，就忽视这一问题。这里必须注意到能使农民群众减低生产兴趣的办法，如多次分配土地。据你们的报告，你们的土地分配了四五次，这种办法应当尽量避免的。保证与白区的贸易，供给苏区民众日用必需品，现在敌人还没有封锁，但是你们必须注意这种可能的危险，设法打破对外贸易上的困难。实行累进税与土地税，加强苏维埃的财政工作。用一切方法准备红军给养，“到一处吃一处”的办法，是不经常的。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巩固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

（四）加紧群众工作，领导一切群众斗争，建立一切群众的组织。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你们没有给我们报告，我们

所能知道的就是你们只有贫农团，但是它的活动情形，我们不晓得。至于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工会、雇农工会都是没有。其他的群众组织，如反帝团体、互济会、合作社、文化团体，是否建立起来，也不知道。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应当立即开始转变，坚决的去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政治与经济斗争，立即把上述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来和积极活动起来，以此来巩固苏区和扩大我们的力量，来反对我们的敌人，只有依靠广大的群众，只有用群众的力量，才能打破我们的一切困难，才能战胜我们的阶级敌人，才能解决摆在你们目前的迫切任务。

（五）经常注意肃反工作，把这个工作，看作是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你们虽然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必然会加强。他们将仍旧企图用种种方法钻入我们的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和阴谋。因此肃反工作仍然不能忽视的。在这个工作，首先要消灭过去对反革命派过分估计的错误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应当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采取分化策略。第二，把肃清我们机关和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与肃清地主豪绅的斗争联系起来，不要孤立的去做这一工作。第三，组织政治保卫队，在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中去进行工作，同时建立司法系统。第四，进行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在思想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六）建立与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你们不但不注意如何去扩大我们党的组织，反而把整个党都解散了，甚至否认一切过去的党员，不分皂白，须重新入党，且须经过干部的介绍，这是莫大的错误。同时对于干部的提拔也须经过保卫局的审查，这又是不正确的。你们以

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改造党和肃清一切异己分子，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这只是关门主义和过分估计敌人力量的错误表现。我们认为改造党的工作是必要的，但不是像你们所采取的那种方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党的方法，就在于开展反对一切倾向和机会主义，首先是反对悲观、失望，与害怕群众等等的错误作斗争，为执行正确的党的路线而斗争，启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大胆的对先进的工人，雇农和贫农开门，勇敢的提拔在革命战斗中考察过的新干部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坚决改善党的成分，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加强对于党员群众的教育，加强我们党和群众的联系与领导，在宣传鼓动中必须细心的注意到民众的社会成分。当然，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应该用最大的努力来巩固工人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这一路线又必须在党报的名称与内容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认为你们的党报的名称，与其用“无产者”（在工业区这是非常之好），不如用“斧头镰刀”或“工农报”，这样的名称能发动工人与农民。我们的报纸同时要处理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的利益。你们必须把党报立即出版。各种的党的教育网，如党校、训练班、列宁小组等等，要用一切方法建立起来。

（七）立即开始关于苏维埃第二次之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日，在中央苏区举行第二次苏大会。你们应当现在就开始这个选举运动，选出你们的出席代表，保证代表在十月间到上海转送中区。你们必须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广大的政治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发动群众参加选举，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讨论与检查苏维埃的过去的工作，使这个运动成为改造苏维埃的运动。我们应当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向群众解释二年来中国苏

维埃运动的成功与经验，告诉他们中国革命的内容与进行状况，唤起他们来执行我们的任务，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

中 央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杨光华。

中共中央关于帝国主义 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 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 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与严重，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继续发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惊人的生长与扩大，使中国的革命形势更进一步的紧张与尖锐化起来。最近一时期的许多事实，确切的证明了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的估计之完全正确。我们正处在中国革命与战争的中间，革命形势的开展正走到了一个急剧的转变的关头，决定中国革命形势增长的三个主要的因素与柱石是更扩大与尖锐了，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支流是猛烈的增长着。这是：

(甲)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终结的基础上产生的瓜分中国的战争，是以全力在进行着。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的援助之下，开始了并继续的以全力来扩大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满洲、热河以及河北北部的并吞（这是帝国主义东方宪兵造成在东方的反苏联根据地之重要的步骤），并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心，他的强盗的血手向着内蒙古与外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四期。

蒙人民共和国伸张着；英法同样是实际的占领了西藏、西康与云南、贵州；美帝国主义者正在锐利的注意着他自己剥夺中国民众的“权利”。同时为着缓和自己内部冲突和竞争，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造成统一战线来瓜分与共管中国（李顿报告书、国际联盟下技术协助中国调剂委员会之设立等）。五分之一的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之下，整个中国在殖民地奴隶命运的威胁前面。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与出卖，非但不能缓和民族危机与帝国主义侵掠的野心，相反的只有更加刺激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强盗掠夺的贪欲。但是日本的军事侵掠、民族压迫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激起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风暴般的反帝斗争的高涨（满洲、热河、河北的游击战争，反日罢工、示威、抵货与航空救国等等），虽然他在各个地域中间发展的程度还带着明显的不平衡的性质与由于我们工作的错误与弱点还没有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但是，无疑的运动是在更扩大与深入，更多的带着群众性质，而成为丰富的革命源泉，是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有力的支流。

（乙）经济崩溃的大踏步的前进，工业首先是民族工业的主要部门轻工业的倒闭与减工（丝厂的全部停业，纱厂减百分之五十，面粉、树胶等工厂生产量半数以上的锐减等），对外贸易的惨落（入口减百分之三十，出口减百分之四十八，而入超反增百分之六点二），农业中整个部门的毁灭（如育蚕、茶叶等）与全般的衰退，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创痛未复，新的普遍全国的水灾又发生了，这结果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产业工人是被抛弃在工厂门外，工人生活状况之恶化、农民的破产赤贫化与成千成万民众的饥饿，达到空前的程度。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反对资本进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官僚机关之

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是继续的增长着（顽强的罢工斗争、失业的斗争、示威、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

（丙）帝国主义国民党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军事技术的提高、政治觉悟的坚定、苏区及国民党区域中广大劳苦群众对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的热烈的拥护，及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是被我们彻底与完全的粉碎了！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不但巩固着自己原有的阵地，而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将苏维埃运动的种子与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四川、满洲及西北的陕、甘、晋）。红军主力非但没有遭受到损失，相反地在与敌人残酷的战斗中增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敌人的十几师的军队是覆没了，敌人的全部计划粉碎了，这是中国革命史新的光荣的一页。这种伟大的胜利，是在全中国革命形势急速的开展的基础上获得的，这一胜利更加尖锐化了全中国的革命形势。

（二）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的开始，是在上海工人与十九路军士兵英勇的保卫上海斗争被国民党出卖与镇压之后，他的进行继续了差不多一年，他的最后的结束是在二、三月间国民党军队在黄陂东陂的惨败之后。紧接着东黄陂惨败之后，蒋介石曾经几次企图依据他原有的力量不变更四次“围剿”的总计划，向我们作新的进攻。但是这一切企图都是失败了，使着蒋介石不能不暂时的改变积极的进攻为城防的政策，而在新的基础上调遣新的军队，组织新的力量，以较长期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总结四次“围剿”这一时期的经验，无疑的我们是得到极大的胜利与成功，苏区是巩固与扩大了，全国红军有一倍左右的数量上的增加，红军的战斗力是大大的提高了，苏维埃政权是更进一步的巩固

了，他对于全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更加扩大了。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我们党的工作亦有了进步，党的政治影响是极大开展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及本身的组织力量是增强了。四次“围剿”的冲破指示给全中国民众看，苏维埃革命是千百万群众参加的民众革命，有着强固与不可克服的力量，一切企图以武装进攻或经济封锁来阻止或消灭苏维埃运动，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惨败。更使他们了解，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因此，推动着广大的群众更进的革命化，并使中国存在着的革命形势有进一步的开展。当然，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间，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异常重大的弱点，这是主要的表现在我们没有能够把国民党区域中开展着的反帝斗争及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更大开展起来，提他到更高的阶段，把他们与工农红军胜利的战斗配合起来。在反帝运动中，一方面我们还不善于依据在工厂的基础上，建立广大的群众的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个别的地方，常常以上层勾结代替了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因此妨害着我们对于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在工厂与企业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薄弱与缺乏经常的持续性，与广大的无组织的以及在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几乎完全隔离的状态还没有能够克服，领导反抗资本进攻的罢工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还非常的不够，战略与战术许多屡次重复着的错误（日常斗争的轻视、下层统一战线之不了解、隔离反革命派不足及盲动主义倾向等）还存在着，这就使我们不能够把比较初步的广大群众的运动发展成为较高阶段的斗争——政治总罢工以及其他的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形态。党还没有能够最迅速的利用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揭露改良主义派别的面目，把他们和群众隔绝起来。士兵中的工作不管士兵不满的增涨，我们的工作还是极端薄弱。在军事方面，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

中，我们还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全国的集中的军事领导，因而不能够在单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配合的遂行战斗任务。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是非常的不够。战略与战术方面的机动与活泼性还很差。红军后备军的组成还赶不上战斗开展之需要。在苏维埃方面，中央政府还缺乏对各省苏的集中的领导，对于苏区经济上必须的建设以保证我们军事的胜利，仅在开始。苏区工会还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党的发展及领导方式之布尔什维克化，还只有初步的改善。所有这些弱点就妨害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中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之实现。

（三）革命形势更进的尖锐化，使得解决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的或者帝国主义的出路问题极端的尖锐起来。在中国前面放着绝对的问题，或者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而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在最短促的历史时期之中。帝国主义正经过国民党来实现他完全瓜分中国，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计划，而国民党忠实的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他们清除道路。在这整个的计划之中，新的大规模的五次“围剿”是不可分离的重要的一步。在四次“围剿”粉碎之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即刻开始了新的五次“围剿”的准备。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最卑鄙无耻的公开出卖华北，签订了极端污辱中国民族的华北停战协定，以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赞助来进攻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宋子文的周游欧美，以出卖中国的各种权利为条件取得了美国的二万万万元的棉麦借款、英国一万万元的军械借款，以及许多其他的密不宣布的秘密借款。同时国民党召集了新的五省“剿匪会议”与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总结了他们在四次“围剿”中失败

的经验，并重新确定了新的进攻计划，组织军官团，重新训练自己的军官，调遣新的大批的部队入赣，招收与训练新的十五师军队，用一切收买与利诱的方法，团结反革命的各派军阀，一致的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以严酷的白色恐怖、非人的拷打、监狱、屠杀与暗杀镇压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革命运动，同时更以武断的欺骗宣传，愚弄与麻醉群众。阶级敌人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新的“围剿”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在这次“围剿”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是更加增强了，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与组织，新的“围剿”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最凶恶的步骤，它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及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即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要胜利。

（四）冷静的估计目前形势的时候，应该指出：四次“围剿”的粉碎，革命形势之新的紧张化，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是一天一天的削弱。财政上的困难随着广大地区之丧失及国民经济之崩溃而日益增长，大批外债的借入将给国民经济的破产及今后财政上的困难以新的激励。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更加促进了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忿恨，揭露了国民党的无耻民族武断宣传。由于屡次军事冒险的失败，不仅广大士兵群众不满意及不愿和红军作战的情绪增涨了，而且中下级军官的惧怕红军的心理是普遍在国民党的部队中生长起来。反帝斗争与工农革命运动，不管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如何严厉，是在蓬

勃的增长着。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军阀混战的爆发虽是暂时阻滞着，然而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削弱，国民党统治的急剧崩溃，这种削弱是将要随着我们的新的胜利与工作的改善而更加加速。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这个胜利将更大的扩大联络各个苏区与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将根本击破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来完全殖民地化中国的计划，而使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武力冲突成为必不可免的前途。正因为这样，所以新的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残酷与剧烈的战争。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要争取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苏维埃的出路，那我们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的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与革命战争。

（五）在这种情况下之下，中央认为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下列的紧急的战斗任务：

（甲）苏区的党的组织

一、必须立即战斗的动员群众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的周围，广大的解释阶级敌人新的进攻的形势，及我们有充分的条件粉碎这个进攻，号召全苏区的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

二、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完成中革军委会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继续采取一切方法来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自觉的阶级的纪律与政治觉悟，扩大与加强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政治的训练，使赤少队成为红军的现成的后备军，在

军事机关第一声号召之下，立即加入红军，这是从实际上准备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的步骤。

三、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击区域。必须保证游击队中坚强的军事与政治的领导，与游击队中脱离及违背党和苏维埃政策的举动作无情的斗争。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四、红军各部之间必须在整个的战略意志之下，遂行战斗的任务。中革军委应集中与加强对于各个苏区工农红军的领导，以保证更好的互相呼应与行动的配合。

五、加强与改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央政府必须以更大的努力来加强自己对于各个苏区的领导作用，并采用各种具体的方法来组织与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群众的革命斗争，最大限度的开展与深入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经过查田运动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地主的残余，削弱富农的力量，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和活动。同时在查田运动中必须以最大注意去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加紧开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严厉的与一切忽视工人日常利益的倾向斗争，这样去加强工人在苏维埃及红军中的领导，在这个基础上采用广大的民主主义及自我批评来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

六、为着保证红军的给养与供给及进一步的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党及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合作社运动之开展，是这个战线上的主要的一环。秋收与食粮收集储藏运动同样是目前战斗的任务，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水利灌溉之修理与增添，是保证明年春耕运动胜利的前提。党必须与借口战争不管一切经济上的建设，或者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任务，忽视战争动员的倾向斗争。

七、党必须加强在附近苏区白区中的工作。这里首先应该利用一切军阀的压迫、苛捐什税、地主的榨取，提出具体的口号以开展群众斗争，吸引到更高的阶段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的注意力应首先放在大的中心城市及工人集中的区域中去。

（乙）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党的组织

一、必须立即进行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的进攻苏区的广大的煽动，指出这个进攻与国民党的出卖中国的政策和资本进攻是不可分离的。号召与组织反对进攻苏区的示威、抗议、罢工、游行、集会与群众会议，在码头与运输工人中组织警备委员会，阻止一切进攻苏区的军火的运输，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在“集中全国兵力开赴华北收复失地”的口号之下，反对调兵入赣。提高每个群众的斗争，使它和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进攻联结起来。

二、开展与加强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执行中央最近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信及致满洲省委的信，大胆的广泛的应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尽可能的利用一切公开半公开的可能。应利用反帝非战同盟代表会的举行来开展反帝的斗争，必须利用每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的事实，进行广泛群众鼓动，揭破国民党一切的武断宣传。党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去争取我们对于满洲及河北的游击运动的领导，必须尽量的在群众中，在反帝的宣传鼓动中，普遍“中国民众与苏联的兄弟联盟”的口号。

三、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坚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

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

四、领导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灾民、难民、兵士、广大的农民群众为了日常利益而斗争，从领导他们的斗争中，使他们参加到斗争中来，引导他们走向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走向为了苏维埃的中国的出路而斗争的道路。

对于灾民、难民的工作，因今年的新的水灾的形成，也特别占到了重要的位置。对于各地发展着的游击战争，党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去领导与组织，使他们走向创造新苏区的道路。在士兵群众中，我们的任务不是简单的个别士兵的拖枪逃走，而是在士兵中进行领导他们日常的斗争，组织士兵到士兵委员会或反日会中，组织大批的士兵的暴动与哗变，为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而斗争。在国民经济总崩溃、水旱灾荒日益发展的情形之下，党对于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同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任务是丝毫不能分开的。

（丙）但是要完成这些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扩大与巩固我们的党——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开展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与罗明路线的思想斗争，把一切对于党的战斗任务消极、怠工或感觉到疲倦的分子驱逐出去，吸收大批的新的工人干部到党内来，教育他们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党必须用耐心的详细的解释工作，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使全体党员同志了解目前五次“围剿”的形势与我们党所负担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提高他们最大限度的积极性，转变一切党内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到支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依靠在千千万万工农群众的力量上来坚决执行共产国际与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克服一切我们在发展中的与胜利中的困难。我们相信，我们不但能够击破帝国主

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而且能够取得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 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秦 邦 宪

同志们！当着我们来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期，是中国革命剧烈发展的时期，是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的尖锐化、激烈化的时期。我们处在最负责的历史转变的紧急关头，我们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漩涡中。

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民经济总溃崩，加上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形势更进的发展起来。这个革命形势更进的发展，已经进到了中国向哪里去的斗争的最尖锐的关头。现在在中国面前放着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一条是帝国主义企图经过国民党而实现的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跳出民族危机和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苏维埃的道路。或者是贫困的被压迫的奴隶的殖民地中国，或者是解放的自由的独立的苏维埃中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争取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出路，把存在着的革命形势，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确立独立自由

^{*} 这是秦邦宪在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红色中华》。

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是放在我们党面前的最负责的光荣的任务，而历史给我们解决这个任务是很短促的了。

一、中国革命形势的尖锐化与四次“围剿”的击破

中国革命形势的增长是依据着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是在继续的尖锐化。中国革命有三个主要的支流，汇合起来而造成了今天日益增长着的革命形势，引导到中国劳苦群众的民族与社会解放的总目标。这便是：

第一，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深痼与团集在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的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涨。在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终结的基础上，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他的强盗武力侵略。从“九一八”以来，经过锦州的攻取、哈尔滨的占领、上海的战争、山海关的攫取、热河进兵与华北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扩大其侵略中国的强盗战争。直到现在为止，被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的中国领土有四百万方里，统有六千余万的居民，包括四个半省份，就面积来说，超过我们中央苏区十余倍；就人口数目来说，超过我们中央苏区二十倍。在这样一个短时期中，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得到这样大的“成功”，却不能不感谢国民党一贯的投降卖国政策。大家知道，国民党将军的不抵抗主义，在一个晚上断送了整个东三省。以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国民党的军阀政客们曾经屡次的改变了他们的口调，从“不抵抗”与“逆来顺受”而“长期抵抗”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最后则公开下令“如敢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签订最污辱的奴役中国的华北停战协定及密约。这个密约据广东军阀所揭露的有以下的内容：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前隶于中华民国之奉吉黑热四省，即为“满洲国”领土；

（二）中日满为保证东亚和平，于必要时，日本得派遣舰队停泊于中国沿海，日满陆军得通过或防守于中国察绥两省以防止中日满之共同敌人来侵，但必事先通知中国；

（三）为复兴东亚经济于平定之途，中日满得互为友好的提携及内战戡平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尤须注意国内排货排满之制止；

（四）中日满正式协定，须于中国方面认为可能时始得协定，中满国界之确定于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始会同明确划定之，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时，此原则协定即失效力。

（五）休战之协商及缓冲地带之划定，由中日军事当局于此原则协定成立之翌日实行之。

这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所大声疾呼“不涉政治”、“不屈服”、“无条件”的协定的幕后的真相，现在每一个人都会了解这是最耻辱的卖国条约。断送中国莫大的领土、主权、独立与整个民族利益的投降协定——这是国民党加于中国民众身上的新的锁链，不粉碎这个锁链，中国民众将永远为帝国主义的奴隶。只有苏维埃政府在这个协定订立的次日便代表全国民众否认这个协定，并号召全国民众为粉碎这个新的锁链而斗争。

但是国民党的这种无耻的投降，却不能使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因此稍为减弱他的野心，相反地只有更激励他们的贪欲。日本正在企图将他的肮脏的手伸到内蒙古，正在冯玉祥的勾引之下，向察哈尔内蒙进攻。长城以北六千万的居民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炮火之下，殖民地的命运在全中国民众的面前威胁着。

不仅是日本，国际帝国主义都积极的企图瓜分中国。英法

是日本侵略政策的积极的赞助者。而且英国实际已占领西藏，经过喇嘛来进兵西康。法国实际上统治了云南、贵州。美帝国主义者同样地是锐利地在注意着他们剥削中国民众的“权益”，及造成他的势力范围。同时为着缓和他们自己在瓜分中国问题周围的矛盾与冲突，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实行与扩大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国际共管。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所说的“依据孙中山博士之提议，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便是这种企图。最近国际联盟——这个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机关，新设立了一个“对华技术合作调协委员会”，就是实现与扩大对华国际共管的具体步骤，就是策划如何瓜分中国共管中国，在加紧剥削和奴役中国劳苦群众中，使他们中间的利益能够调协的机关。

国民党政府对于这种帝国主义对华国际共管的政策，大家知道他是采用欢迎与拥护的态度。国民党事先参加了李顿报告的制定，事后恭维李顿报告之公正，并认为可以作谈判的基础。尤其显著的是宋子文在最近世界经济会议上的演说，这演说是“野鸡拉客”式的欢迎国际共管。他说：

“中国地位已如此，今后将何如乎？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提高，如吾人所欲为者，则其购买力不独可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商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机会供中外资本之生利的运用，想世界的政治才能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之政治与经济的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也……但吾人不愿采取亚细亚门罗主义，吾人且将反对国家与地方之孤立……吾人欢迎西方之技术与资本，并愿维持不阻止外货入境之理财政策……”。

这里，公开拍卖中国，卑辞屈膝的欢迎国际共管，是最清

楚没有的了。事实放在面前，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清道夫、尖兵。

在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下面，在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卖国政策下面，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直接受着殖民地化的奴隶化的威胁。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虽然得到国民党的拥护，但是千百万的劳苦群众和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都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反抗国民党的投降路线。在一天天增加的民族危机之前，中国工农群众反帝斗争一天天的开展，成为中国今天的直接革命形势主要标志和因素。在满洲、在河北反日的义勇军游击运动是广泛的开展着，其中一小部分已经在赤色的苏维埃旗帜之下。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占领满洲，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非十年时间十万大兵不能压服满洲民众的反抗。除义勇军、大刀队……的流血的武装斗争之外，可以看到其他的各种反帝的斗争方式，如像日本企业中的工人罢工、反日的示威游行以及广大的发展在各城市各区域的抵货运动，都在白区开展着。在这一反帝斗争中间，包括有各个阶层的分子，他们的要求也各有差别，在各个区域与省份之间还带着明显的不平衡性质，但是都更明显的走向日益革命化的道路，这给我们以极大的可能组织群众的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展他到更高的阶段上去。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依据苏维埃和红军的发展，加上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经验，广泛的运用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树立和巩固在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将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源泉，成为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有力支流。

第二，全中国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继续发展与深入，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中，中国国民经济进到总崩溃的破产道路，全

国的工农劳苦群众陷于失业、失地、饥饿、冻死、饿死。这个总崩溃的情况，即使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臣仆亦不能掩饰的了。譬如中国银行，以如下的悲惨暗淡的词句开始了他的一九三二年的报告：

“民国二十一年，遭民国以来未曾见之国难，无异积弱之身忽染时疫，百病齐发。政治则举国皇皇几无一日之安定，社会则农村衰落几至全国人民沦于失业，经济则旧式商业组织奄奄待毙，几次第崩溃，金融则资金集中都市，内地血脉完全停滞。”

更仔细来观察这个经济总崩溃的形势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的图画：

甲、民族工业的关厂、倒闭、减工与生产量之锐减 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工业、重工业是非常的薄弱而且几乎全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民族工业的主要部门是轻工业：首先是纺织与缫丝。在纱厂方面在去年似乎是锭子数量在表面上有些增加，而纱的销路却大大的减少，上海七十一家纱号去年倒闭者共十七家。今年则纱厂一般的减少了生产量。今年四月间，中国纱厂决定取消星期六的夜工及星期日的工作，名义上是一个月的暂时的办法，而直到现在上海二十八家纱厂之中还有十七家继续减工，棉织业则在一九三二年减少了生产量的五分之一。丝厂则在完全破产的状况中，上海九十七家丝厂去年开工的仅十一家，今年仅十家；无锡四十七家开工者仅九家；丝织厂上海共五百六十七家，去年开工者仅半数，生产量减少百分之三十。机器制造业去年减少生产百分之三十。近年来比较发达的化妆品工业，去年营业亦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这是一幅民族工业衰退破产的悲惨图画的轮廓。

乙、对外贸易的急剧的减少 去年进口货总值十万四千九

百二十四万两多，比前年之十四万三千三百四十八万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出口去年为四万九千二百六十四万两，较前年之九万零九百四十七万减少百分之四十五点八；进出口总计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六，而入超反增加百分之六点二。

丙、农村经济中几个特殊部门的毁灭与一般的崩溃 丝茶是中国特殊产品的重要部门。拿去年来说，主要产丝茧的江浙两省的生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在价格总值方面减少百分之七十，许多江浙的桑田现在是毁灭了，改种了别的产品。茶叶历年来亦早在衰败之中，去年茶叶出口又比前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五。米麦等主要产品虽去年未受灾荒，但因为洋麦洋米的倾销，使得价格大跌，更陷农民于破产的境地。今年则新的大水灾普遍在全中国的范围内了，前年水灾的创痕未复，今年新的水灾又将使崩溃中的农村经济更加速其过程。

这种经济破产的结果，使工人和农民生活日趋恶化。广大的群众失业，现在有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产业工人是失业者。正因为广大的农村经济的破产，大量的农民跑到城市找工做，在城市流浪着。资本更利用这些产业后备军，残酷的向工人的生活水平进攻，一二年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工资要减少三分之一。这还是名义上的工资，而实际工资则减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工作时间却延长了，特别是工作的强度是增加了。譬如一个城市女工，她从前管理四个布机，现在就要管二十四个布机，甚至还要更多些。座中有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布厂中做过工的同志，将会发问：一个人如何能够管理这么多？但是事实如此——一个女工需要管三十个布机，工作强度是大大的增加。工厂的卫生设备非常的简陋，如上海正泰橡皮厂，是经过国民党调查，而认为所谓“设备最安全与满意”的工厂，但是在国民党检查不及一星期之后，汽锅炸裂，使二百余男女工人

葬身火窟。农民生活的恶化，更不必说的了。军阀混战、地主的抽剥、苛捐杂税、谷价惨落、水旱灾荒、强迫修马路、禁止食盐自由使用等，给农民无限痛苦。至于东三省热河和河北北部的整个农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和大炮之下毁灭，千百万的农民在生死不得的地狱中挣扎着。在这种帝国主义、国民党贪狠的掠夺与剥削之下，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担负着经济浩劫所生的全部重担，使他们不能不在饿死与反抗中选择出路。更加上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的增长，吸引着最广大的千百万工农群众卷入汹涌的反攻资本进攻与地主国民党官僚机关的残酷的掠夺。最近时期中，白区农民抗捐暴动、游击战争的继续爆发，其范围与区域的广大、群众性质的显明、农民斗争之坚决与勇敢，逐渐的更走向争取土地，实行摧毁封建势力统治的土地革命，这些，同志们可以从“红中”九十三期的特约工农通讯中看到，不再多说。至于工人阶级的反抗资本进攻的斗争是日益发展着，去年全国比较大的斗争如太古轮船公司罢工、津浦路济国罢工人人数达一百十万以上，最近时期中南六厂的罢工^①，京沪、沪杭两路员工加薪的斗争，北平电车工人的罢工，天津、武汉纱厂工人的斗争，风涌于上海橡皮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等等。虽然斗争还大部分是经济的性质，但政治要求更加明显，斗争的特殊的顽强性，常常一厂罢工转为整个企业的同盟罢工，党在罢工运动的领导作用的加强，都是明显的事实。我们领导还薄弱，因而不能将他发展成为更高阶段的斗争——政治总罢工。工农斗争是汹涌地开展，这是革命形势中的强有力的支流。

第三，红军惊人的生长与胜利，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完全粉碎，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非但不以一卒一兵去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不管苏维

埃政府与红军屡次宣言，愿意与真正抗日军队订立战斗协定，而国民党集中其全国的兵力向苏区作第四次绝望的进攻。

从去年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开始进行对苏维埃和红军的四次“围剿”，而东黄陂的战役的伟大胜利把他完全与彻底粉碎了。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间，我们获得了极端伟大的胜利：消灭了敌人的十几师基本主力部队，创造了四川、湘鄂川边的新苏区。在最初，敌人以十倍于我们的兵力向鄂豫皖苏区进攻，加上我们主观上某些策略上的错误，使红四方面军不能不离开鄂豫皖苏区，作有名的几千里的行军。从皖西北通过京汉路、豫边、陕鄂边到四川，几千里的行军，这种行军只有工农的阶级的武装才能做得到。红四方面军在这远征之中所以能够胜利的在巴中南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是因为他受到川豫边的几十以至几百万劳苦群众的爱戴，农民暴动起来响应红军，白军士兵哗变加入红军，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就在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和配合中形成。他把苏维埃运动散布到北方和西北——这些大革命时代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当红四方面军占领川北的时候，川西工农组织了十九县的抗捐大同盟，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响应红军。到现在离成都四十里的地方都有红军活动，四川军阀极端恐慌。蒋介石委刘湘为“剿共”总司令，团结起四川军阀来对付四方面军。为什么？因为红军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五六县的根据地，由于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使四川军阀发抖起来。至于红二军团现在不仅恢复了洪湖的根据地，并将主力移向川鄂湘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和四方面军的活动互相呼应。国民党老早就造谣贺龙同志领导下的红军没有了，最近却惊呼贺龙部队的化零为整集中有三四万人了。鄂豫皖苏区自从四方面军离开以后，国民党就在纸上口头上宣传鄂豫皖苏区没有了，但是根据最近

消息，不但鄂豫皖苏区保持了旧有的区域，而且取得了发展。红二十四军、二十八军在商城光山一带与白军宋天方、戴民权部激战，戴部损失过半。同时皖西六安一带的红军，已开到商城与红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会合，预计最近期间内可攻下新集金家寨，与鄂东之二十五军打成一片，向七里坪河口进攻，包围黄安，恢复鄂豫皖苏区旧的据点（上海工农电讯）。四方面军离开后，创造了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三个军，整理和恢复自己力量向敌人反攻。中央苏区的红军，在这时期中，消灭了敌人五六个师以上的实力，仅仅在东黄陂战役，消灭了敌人四师兵力，覆灭了中路军的最强的纵队，使敌人的四次“围剿”完全遭到惨败。国民党对自己的惨败也不能在群众面前隐瞒起来，不得不公开的承认是受了失败，使蒋介石不能不作出“隐痛实深”的哀鸣。虽然在东黄陂战役之后，蒋介石曾经企图在四次“围剿”的旧有基础上作新的反攻，然而这个企图，没有能够实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开展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而这个胜利更使中国的革命形势尖锐化与紧张化起来。

这是造成今天中国革命形势的三个主要的柱石。依据这些事实，所以我们确切的断言，全中国的革命形势是在继续的增长，我们正逼临着新的大革命风暴。

二、四次“围剿”的总结

当我们现在已经胜利地完全粉碎了四次“围剿”之后，我们应该冷静地仔细地来把这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一下。这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正当着敌人今天疯狂般的准备新的绝望的五次“围剿”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问我们依据着什么基础击破了四次“围剿”？

第一，当然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以及我们在红军建设上的大踏步的前进。英勇的工农红军依靠着冲破三次“围剿”的经验，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一般的提高了军事技术与政治自觉。假如在一年、一年半以前我们的红军还仅仅从游击队变成正规红军的开始，那么在四次“围剿”之中，我们已经锻炼红军走上正规的常胜的铁军的道路，游击队的习气是逐渐克服了。靠个人天才的作战指挥，已经变成了采用全世界新的战略与战术的指挥。强健的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坚固的共产党的骨干都在军队中建立了起来，新的部队有大量的增加——尤其是在今年五月及以后一个短时期中，这是我们所以能够胜利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奉献于战争的热忱。在阶级敌人疯狂般进攻面前，苏区劳苦群众为着保卫苏维埃政权，为保卫土地革命，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热烈的自愿的加入红军，赤少队的模范队整营整团整师的加入了红军，愿意以自己生命为苏维埃政权流最后一滴血。在经济战线上，党依靠着群众的积极性解决了今年春季的粮食困难，二十万担的借谷运动得到了伟大的成功。《红色中华》退还八十万公债节省三十万的号召，在短短四个月的时期内达到了五十余万元的成绩。这个群众的热忱在春耕夏耕秋收查田中都充分的表现了出来。这种一切愿意牺牲为着革命战争的热烈情绪是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今后更伟大的胜利的出发点。

第三，然而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不仅得到苏区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而且得到了国民党区域中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正因为工农红军是中国唯一的真正民众武装，代表着全国劳苦群众的民族与社会解放的利益而斗争的武力，所以他们在与阶级

敌人的决战中，到处受到劳苦群众的热诚的拥护与爱戴。不必说，四方面军在远征中，在四川，是如何的到处得到了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最著名的如巴中的占领，由于四郊的农民暴动而夺城。不必说，上海工人是怎样的关心红军的每一个战役，以红军的胜利为自己的胜利，尽量的用一切方法来拥护红军。如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征收“剿赤”捐而爆发了顽强的斗争。一个铜片捐助红军的运动，和购买飞机赠给红军的运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获得很大的成绩。虽然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募捐买飞机的款子还没有完成购一架飞机的数目，但并不因而减少募捐的意义。其他购买西药军用品捐赠红军，赠送胜利的红旗制草鞋等等，上海的拥护红军运动成为一九三二年上海党最有成绩的群众运动之一。不必说我们方面军在南丰、南城、宜乐、新淦等区域中怎样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即使在离开我们较远的地方如满洲、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方，红军与苏维埃的影响亦是日益增长，譬如沈阳与长春的工人热烈的要求加入红军；譬如直南有一个数千人的农民大会通过了拥护苏维埃政府并要求援助的电报；譬如在北平黄色工会所召集的七百多人的各业工人的代表会与到会代表一致拒绝国民党工会官僚提出的组织“铲共义勇军”的提议，公开声言“共产党与苏维埃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应该去打他，枪口要朝外放”。这些都证明着国民党区域中群众拥护苏维埃情绪的热烈，苏维埃与红军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之灯塔。

最后，我们不能不说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是这个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假如我们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的领导，假如我们执行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我们便不能够获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正因为我们的坚决的进行和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

争，才能够获得光荣的伟大的胜利，我们的胜利是在残酷的反机会主义斗争中获得的。在这一个时期中，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不论在白区、在苏区都加强起来，党的政治影响大大的扩大了。在上海“九一八”和“一二八”及北平的征收运动中，党在组织上巩固亦得到了相当的成绩。在罢工运动中，党的领导作用日益加强，党不顾一切困难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权。苏区的党在反对罗明路线中表现他的政治的坚决性，使那些罗明路线的英雄们成了没有军队的将军。党的工作方式亦开始向着活的具体的领导方面前进了。假如我们没有党的工作的改善与党员群众的积极化，那就不能获得这样的胜利——不论在战争方面，在经济战线上面。

自然，这决不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间已经没有错误弱点。错误与弱点显然的存在的，而且还不少。假如我们能够不做一些错误早就克服这些弱点，我们将有更大的成绩，更大的胜利。我们可以完全实现我们以前指出的在粉碎四次“围剿”中争取几个大城市开始一省数省胜利。在军事战略上我们的错误与弱点是全国红军还不能在单一的战略意志之下，实行互相配合的牵制敌人消灭敌人，这是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极大的弱点。用具体的事实来说，当敌人向鄂豫皖苏区进攻的时候，中央苏区的红军东攻漳州，南下南雄，没有能够最大的牵制进攻鄂豫皖的敌人的行动。而在东黄陂战役的时候，也没有取得各苏区互相配合，这是一。第二，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尤其没有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发动新的游击区域，使敌人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中。譬如说，在北方战线上东黄陂战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丰城、东乡一带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2〕}的游击队时，那我们的胜利一定更要比现在大得

多。不管白区农民斗争的高涨，我们还没有组织许多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再则我们技术上还是薄弱，在夺取敌人据点，冲陷敌人营寨中以及别的方面表现出来，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技术没有进步，可是这种进步与今天的要求相比的时候，是万分的不够的了。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时刻准备与现代帝国主义武力直接作战。同时我们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一二三个月中，是在停滞的状况，假使在半年或者一年以前完成了最近这个扩大红军的数目，那将可以得到更大的胜利。这是我们在军事上的经验和教训。

至于在政治方面，在其他工作方面，我们错误与弱点更大更多。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曾能够把国民党区域中开展着的反帝斗争与工农群众为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日常斗争，提高他到更高的阶段，使他们能够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胜利汇合起来。在反帝运动中，我们的重大的弱点是不善于正确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及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不是在反帝运动中拒绝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将一切还没有了解苏维埃是中国唯一出路与拥护苏维埃的分子都当做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走狗，那就在统一战线中放弃了对于同盟者严格的批评其动摇与不坚决，或者则以上层的勾结代替了下层的群众的统一战线，这都妨害了反帝运动的更进的开展与深入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领导权的巩固。在组织工人阶级反抗资本进攻的斗争中，我们还缺乏经常的坚持的有系统的工厂企业中的活动，给每一个资本进攻的企图以群众的反抗，轻视经济斗争的观念还在许多地方党部及工会的干部中存在着。在罢工斗争中一样的不善于与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无组织工人订立统一的战线，具体的每一步的揭露黄色领袖的罪恶，争取群众在党与赤色工会的影响之下，而发展斗争到更高的阶段。其次，如对改良主义的政

治派别的面貌揭发不足，因此没有使每个不满国民党的分子，迅速的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使他们和广大的群众完全隔离起来。最后，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没有很迅速的来克服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在江西是在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以后，才开始揭发和克服江西的罗明路线。

这便是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工作的一般的简单的总结。

三、五次“围剿”——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胜负战争

上面已经讲过中国革命危机的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是互相联系不可分离的因素，造成了今天的革命形势。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实际的统治者，他采用什么方法来应付今天的革命形势，争取革命形势中反革命的出路呢？很明显的，帝国主义一方面尽量扩大其反对中国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扩大他的占领中国的领土，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在贪狠的掠夺中国民众中来挽救其本国的经济危机。另外，为和缓他们本身的矛盾，企图采取共管的方式来统治中国，把中国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的殖民地。这两个政策是在同时并进，他们目的的是一个，就是想从加重奴役压迫的枷锁在中国民众身上来挽救他们不可救药的危机。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之前投降、屈膝，帮助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殖民地化，替帝国主义的政策开辟道路。所以，我们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是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制造者，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国民党以无耻的出卖和血的屠杀替帝国主义争取殖民地化中国开辟道路，然而国际帝国主义要实行使中国殖民地化

的政策时候，必须用极大的力量经过残酷的斗争，击败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与积极反抗之后，才有可能。因此他们将用最残酷的手段，企图把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是把中国苏维埃红军放在血海里面。所以帝国主义正在指挥着国民党向我们作新的第五次的疯狂与绝望的进攻。五次“围剿”是国民党造成国际共管中国，帮助殖民地化中国的有力步骤，是殖民地中国与苏维埃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一幕，是决定中国走向奴役的压迫的贫困的殖民地道路，或者是走向解放的自由的独立的苏维埃道路的历史关头。

从东黄陂惨败之后，蒋介石了解了须要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力量来进行新的“围剿”的准备。这里，第一，必须以更大规模的更无耻的出卖中国来取得帝国主义更大的帮助。因为他深切地了解，假如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国民党是不能进行五次“围剿”的。所以蒋介石在东黄陂战败后曾亲往北平，与日帝国主义谈判，经过黄郛的手签订了“五卅密约”，以出卖辽吉黑热四省，承认“满洲国”，划河北北部为中立区，担任镇压一切排日排满活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他“戡平内乱”。就是说，蒋介石把东三省华北拱手跪送给日本，换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同时蒋介石派遣宋子文周游欧美，同样以卖国条约取得帝国主义军械、军火与金钱上的帮助。宋子文在美国和罗斯福谈判之后，借了五千万元美金，合中国大洋二万万万元的棉麦借款。美国所付的借款并不是现金而是麦和棉花，在美国市场上停滞的过剩货品，经过国民党在中国的倾销，换得现金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宋子文又向英国借了五百万英镑购买军械，到意国和法西斯蒂首领莫索里尼这个混蛋签订条约，无疑的，这又是一个卖国的密约，虽然现在这些条约的内容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看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

议上的言论，也就容易的索隐的了。

其次，蒋介石正在整饬旧的部队，调动新的部队入赣，征募与训练新兵，重新训练军官，以准备对苏维埃和红军的新的进攻。五月初在庐山开会的五省“剿匪”将领会议，正是总结四次“围剿”的失败的一个会议。同时他进行了改编军制和重新训练以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为骨干的军官团，调动新的五六个师入赣，另外还准备训练十五个新的师，已经招募三万五千人在汉口、九江、归德大造兵营从事训练，用收买利诱种种的方法来团结和缓他们内部的冲突，委任了北路、南路、西路的总指挥，使湘敌、粤敌开始更积极的进攻，何键到萍乡，粤敌的积极化都是这个总攻计划的步骤。

第三，为着将经济浩劫的全部重担转移到劳苦群众身上，为着进行五次“围剿”，国民党更加重对于工农群众的压迫剥削、白色恐怖与屠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苛捐杂税的名目繁多，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大晚报的统计，国民党区域中的捐税名目共用一千七百五十六种，收税卡局共有八百九十四处。这已经是足以吓人的数目字了，可是实际上这还是不确的，减少了的数目字。譬如一个在张家口工作的同志在他的信上这样的告诉我们：“从张家口西头到桥东不过几里路，可是捐税局竟有八处之多。每一车子粮食从乡村运到城市来卖，这八个税局一共要收五元二角五分的捐税，而每车粮食不过值价四元。因此农民从乡村中将粮食运到城市中来卖，他必然的不仅得不到一个钱，而且要将车子、牛都卖了，来完清捐税才能回去。”仅仅几里路就有八处捐税局，那全国岂止八百多处？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阀还实行预征捐税，譬如川西的钱粮已经征收到民国六十年（一九七一）了（大公报）。在进行新的“围剿”中，国民党还要预征与增加各种税

项，还要帮助资本家向工人的生活水平继续进攻，这是国民党罪恶政策之组成部分。另外一方面，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凶焰简直把全国变成了监狱屠场。罢工工人、反帝战士、革命士兵、义勇军及暴动农民成千成万的被屠杀，首先是共产党员。统计今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屠杀的逮捕的我党的干部（仅仅是干部呵！）已经不止一二千的数目了，广大群众的被屠杀简直是无法统计的了。而且对于一切不满国民党的分子亦是采取这种残酷的手段，譬如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不久以前被蒋介石的暗杀队暗杀了。杨杏佛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离开共产主义与工农革命是很远的。他只因为不满国民党白色恐怖，主张最低限度的民权保障就被杀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亦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受着暗杀的威胁。国民党企图将一切革命运动沉在血海中，以便进行五次“围剿”与忠实地做帝国主义之下的“甲必丹”！

阶级敌人是在拼命的有计划的准备新的大规模的大举进攻，这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共管中国计划是不可分离的。这是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两条道路斗争的决死关头，能够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才能够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四、我们有取得粉碎五次“围剿” 胜利的一切条件

在敌人的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能不能够打胜仗？这是现在要说的。

机会主义者可以想：五次“围剿”是更加残酷的了，环绕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现在在五次“围剿”还未开始时，已经有五十个师八个旅一个团。即湖南西路总指挥何键有十师一

旅，北路总指挥刘峙有二十六师三旅，南路总指挥陈济棠包括十九路军在内，有十四师三旅一团。机会主义者想来，国民党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有很大的军事力量，有很充足的战争经费，更多的军械，有飞机、毒气等新式现代武器，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只有失败，只有上山。机会主义者看来，我们不能打胜仗，也不敢打胜仗。

我们自然不否认敌人的进攻，不否认敌人军队数量的众多，但是国内战争的规律并不是在于军队数量多才能打胜仗，以少胜多却正是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特点，这正是机会主义者和蒋介石以至国民党的军事顾问所不懂得。即就军事方面来说，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是充满着不满与革命情绪，士兵不愿意打苏维埃红军，要去东北抗日。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十九路军中有四个北上抗日团，从福建经过广州入湖南北上，在到湖南以后，华北协定已经签订了，蒋蔡^③要他们回来福建进攻红军，在中途士兵大半逃跑，只存下一团多的实额，这是士兵用脚表决了要抗日反对进攻红军。又如从东黄陂战役到现在，在每次战役中白军的高级中级军官，多数都在阵线上被我们击毙了。当然我们军事技术的进步，射击力加强是原因之一，但是应该知道这亦由于白军士兵的动摇，使官长不得不在前线压迫士兵作战，白军官长不得不在火线上督师，给我们以击毙的更多可能。时常在战争中白军官长击毙后，士兵马上就派代表和我们接头加入红军，因此蒋介石特别要办一个一千人的军官团，武装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来分布在各军部队里，像苏联国内战争快要结束时期白党所采用的办法一样。这两个显著的事实证明了白军士兵充满着不满情绪与革命化，可惜我们在士兵群众的工作还是极端的薄弱，我们常常还只能够用“拖枪到红军中来”的一类呆板的口号，而

不善于去抓住群众的情绪，组织他们的斗争与哗变，组织他们要求北上抗日，不然，新的宁都兵暴与更大的士兵暴动的潮流是一定的早就发生了。

其次讲到军官，那这般东西真是蒋介石所说的“贪生怕死”之辈，他们一方面受着士兵革命化的压迫，另一方面恐慌做张辉瓒、李明之继，大部分都害怕和红军作战，要求离开江西，使得蒋介石不能不发出“今日剿匪兵力与去年相较实有增而无减何用自馁其气”及“如有再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的命令。这样陈诚只得喊：“目前一切都是黑暗，我们只有一条光明的出路，这就是准备着不顾一切的去赴死”，就是说眼前只有死路一条。这也许可以算陈诚有自知之明罢！然而其悲观失望、茫无前途的情绪是最明显不过的了。再看抱着“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的蒋介石对于自己和苏维埃运动力量的估计是怎样，他在给陈诚的手书中说：

“寇深匪毒，将馁兵弱，危急存亡，间不容发，思之心痛，不寒而慄。”

把这死人的说法变成活人用的白话就是：

“苏维埃运动的深入，红军之英勇，国民党将军的懦弱害怕，士兵的动摇，使得国民党统治到了生死的危险的紧急的关头了……想起来就心痛，即使天不冷，也要发抖起来了！”

没落的阶级、没落的军阀，在澎湃汹涌的革命力量之前心痛发抖也不足为怪的。可是为什么我们队伍中的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竟会在发抖的蒋介石面前发抖，这未免太难于索解了罢！

战地居民的态度对于战争有重大的关系，假如不能取得群众的拥护，就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民众对白军的仇恨，只从下面两个童谣便可以看出，福建的童谣是：“宁愿红军杀，不愿白军扎”。江西的童谣是：“红军打土豪，白军挖灶

脑”。这样痛恨白军的情绪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而红军则随时随地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至于在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方面，那么从报告的第一段中，已经可以知道，最近时期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有了新的变动，这变动是有利于我们，有利于苏维埃和红军的。革命形势的尖锐化，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天天削弱与崩溃，不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民党清道夫的面貌一天天在群众面前暴露，使群众对于卖国的国民党的愤恨愈是增长，而帝国主义的野心却由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而更增涨。财政的困难与国民经济的破产，虽有大批的借款无异于“饮鸩止渴”，棉麦倾销将使农村经济的崩溃到更加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各派军阀间除了出卖中国，加紧剥削工农劳苦群众，这二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之外，在别的问题上因为帝国主义主人的各异，因为各地政治经济上的发展的不平衡及军阀封建割据的状态，使各派军阀间的矛盾，没有法子调和，新的军阀混战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国民党罪恶统治的结果、棉麦借款残酷的剥削、长江水灾的浩劫、工业破产、资本的进攻使工人农民失业失地，没有衣穿，没有饭吃，这使工农斗争将燎原一般的燃烧起来，今年饥饿寒冷的冬天将是热烈的革命斗争的冬天。

而我们的力量和四次“围剿”时比较起来，不论哪一方面都有长大的进步，红军数量有很大的增加，战斗力极大的提高，群众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发扬。我们的力量大大的增加，敌人的力量却大大的削弱了，加上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继续冲破敌人新的五次“围剿”。我们有着一切力量战胜敌人，我们有粉碎五次“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切条件。

五、目前苏区党面前的紧急任务

同志们！新的五次“围剿”是在面前，比以前更剧烈残酷的战争逼临着，我们有着一切的条件取得这次战争中的完全胜利，实现中国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与确立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但是这不是说，胜利是会自然的到来的，我们可以袖着双手坐观其成。不，在这个剧烈的战斗中间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发展的困难，假若我们不能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紧急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来为着争取苏维埃的出路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为克服我们发展中的困难而斗争，那我们便不能胜利。因之，在我们全党及每一个党员面前有着光荣与负责的任务，这任务总的说来，就是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提出来的六大任务，而最主要的便是：

（一）在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

（二）以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进行坚苦的厂内活动，组织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利益的斗争反对资本的进攻。在这个基础上改善我们与群众的联系，转变赤色工会为群众的工会，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三）开展农村中的反对饥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地主的掠夺，争取土地的斗争，尽量给农民斗争以无产阶级的领导与组织性，开展游击战争。

（四）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反对反动政治，反对白色恐怖，保障苏区，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争取革命形势中苏维埃的出路。

在这个总任务之下苏区的党，每一个党员，要努力为着战争的胜利，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口号下，动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参加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突击。

首先我们要更加紧张的扩大红军，组织新的师新的军团，在最短时期内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有人以为红军扩大了这么多了，用不着再扩大了，而且红军多了要增加我们的困难，要使我们忙得不得开交，希望红军不再扩大，以便休息一下。毫无疑问这种心理是完全不正确的。现在红军的数量还是不够的，非常不够的。要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创立是目前紧急的任务，任何疲倦的现象，都要不得的。我们必须依照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最近扩大红军的计划，完成在最短期间扩大八万至十万红军来庆祝第二次全苏大会。其次我们要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不但要在苏区周围组织挺进队深入白区游击，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侧翼去发动游击战争，创立游击区域，使敌人腹背受敌，要记得游击队伍的积极活动，是主力红军在决战中获得胜利的要素之一。为着具体与切实的准备从志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那么扩大赤少队的组织，用一切力量，采取具体的方法去加强他们政治和军事的训练，如实行短时期的野营生活是十分迫切的了。如果我们过去从单个的扩大志愿兵后来动员整连整营到前方参战，经过长期的政治工作，争取队员全部加入红军，最近我们已经能够动员整师整团的赤少队模范师加入红军，那么以后我们的工作的方针要为着动员整队的赤少队加入红军。要使得每个劳苦群众加入赤少队，每个赤少队员能够在军事机关的一声要求之下加入红军，而且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军事知识与技术，一上战线便能够作战以及政治上能够成为一个忠实于苏维埃，能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赤色战士，这样来增加无限数量的红军后备

军，以便迅速的转入义务军役制。复次，便是猛烈的开展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的热潮，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到最好的使用我们一切的武器与工具，如射击、劈刺、掷手榴弹、建设工事等。在指挥员方面必须学习与善于运用最新的战略与战术，更加以政治工作的各方面的加强以更加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保证红军成为常胜的铁的红军。最后，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方法，使得全国红军能够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更好的互相配合行动。

在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方面，我们必须继续采取一切方法来改善他的工作，要使苏维埃成为千百万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成为千百万群众学习管理的学校。为着这个目的，要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以及个别的混入苏维埃机关的地主富农的奸细，要缩小行政区域使他更密切的接近群众，要最广大的发展苏维埃的民主主义的精神，要发展对于工作的弱点与错误的严酷的自我批评，要更加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要加强对于临近白区的边区的及新苏区中的苏维埃工作的领导——而在目前应该说正是这些极端重要的区域中，苏维埃的成分与工作最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目前苏维埃工作改善中的几个主要的链环是查田运动，劳动法正确实行的监督，边区新区的苏维埃工作的改造与创立及苏维埃的改选运动。查田运动中，目前最切要的是要执行中央局决议中所规定的明确的阶级路线，我们要依靠雇农贫农，坚决的消灭地主阶级，削弱富农。然而我们的火力决不能一丝一毫的侵犯中农——侵犯中农是不可宽恕的错误。我们要经过查田运动去更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巩固中农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信任。在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中，必须保证他成为全国性的第二次苏大会，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全部经验与教训。中央政府不仅要领导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而且要组织与领导白区的千百

万工农劳苦群众，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帮助白区的群众的斗争，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群众所围绕着的太阳。

在经济战线上，我们今天有了新的阵容，这便是切实与具体的开始经济建设的工作。为着保证战争的胜利，初步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是绝对需要的。有些同志以为在内战的环境中谁要提出经济建设的任务来，那便是“和平建设”，那便是机会主义。又有些同志以为经济建设是今天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任务，他是高于一切的。我想这都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解决这个问题，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是：

“内战猖狂的时候，专政的强制作用，是特别的显著。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一点就以为在内战期间不能做建设工作。内战的自身，假如没有建设的工作也就不能担保会得到胜利。”（斯大林）

“假使一定要战争，那么一切应该服从战争的利益，一切国内的生活应该服从战争，在这一点上任何的犹豫是不允许的。”（列宁）

为着苏区经济的发展与流通，为着保障红军给养与供给，为着给苏区经济今后发展准备着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前提与基础，目前经济建设中的中心的一环是广泛发展合作社组织，因为合作社能使“私人的利益，私人企业的利益，和国家的监督和管理有适当的配合，并且使私人利益服从于整个的利益，恰到一种适当的程度”（列宁），因为合作社能团集与组织千百万的农民，铲除农村中资本主义以前的那种根深蒂固的顽固守旧的关系，而将集体经济的利益灌施到农民的心中。所以党与苏维埃政权正以极大的力量来推广合作社运动，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以大部分帮助合作社的发展，要做到五十万人加入合作社，这是一个极大的任务，只有以极大的努力才能胜利的

完成他。在广泛的发展合作社运动的时候，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合作社组织的发展必须依据在自愿的原则上，必须以实际的利益证明给农民看合作社的好处，说服农民群众自愿的加入合作社，急躁的追逐数目字而采用强迫的方法去发展合作社，那只会破坏合作社运动而使他流产。在经济战线上的其他的任务，如广泛的设立粮食调剂局，恢复手工业生产，设立对外贸易处等等，我不想多说了。

最后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我想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加强党的力量，改善我们的工作与领导，提高党员政治与理论的水平，使我们的党能够坚强与胜利的领导和国内战争。这里首先我想是扩大党的组织，征收积极的雇农、贫农、中农入党，现在我们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虽然我们在中央苏区已经有十几万党员，但是还是非常不够的，至少我们需要有一倍以上的增加。我们必须研究红五月征收运动流产的原因，我们必须使得每一个同志了解发展党的组织在今天的重要性，我们要以经常不断的努力来发展与扩大党的组织。第二是改善支部的工作与区委的领导，要使支部能够成为群众的核心，群众积极性的组织者，要使区委接近支部接近群众，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根据具体的环境采取切要和具体的方法。最后是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争取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及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纯粹性。在这个紧急的历史转变关头，党内的一部最不坚定的分子中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动摇的表现，如对于长期国内战争的倦怠的情绪，对于敌人新的进攻的惊惶失措，对于土地革命伟大力量的忽视，对于苏维埃机关的污蔑的估计，另外就是那种“没有事情听捷报好了”的盲目的乐观情绪，这实际上是倦怠心理的另一种表现。此外如在文化战

线——特别在戏剧运动中，偷运敌对阶级思想，对于这种偷运私货的缺乏警觉性，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火力粉碎这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继续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这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前提。

末了，请让我引用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领袖——列宁的训示，来结束我这个冗长的报告罢。

“假如一定要战争，那么，一切应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一切国内生活应该服从战争，在这一点上任何的犹豫是绝对不容许的！一切牺牲，一切帮助给与战争，抛开一切的动摇，集中一切的力量，准备一切牺牲。当然，这一次我们是要胜利的。”

是的，这一次我们当然是要胜利的。这一次的胜利，将确立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热烈的鼓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这段文字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出版的单行本上为：“去年全国罢工人数达一百十万以上，最近时期中比较大的斗争如太古轮船公司罢工，津浦路济南六厂的罢工”。

〔2〕指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

〔3〕指蒋光鼐、蔡廷锴。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作战部署 和任务的指示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豪：

沪来电转如下：

一、我们认为广东的进攻，并不是与南京联合反对我们的行动。恰恰相反，这主要的表示在广东要在实际上“剿赤”，献媚英美帝国主义，以便在将来反对南京，夺得更好的帮助。因此，纵或我们通过政治的分析，对于目前的军事形势不甚恰当，但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认为广东的进攻，虽然在目前千真万确的，不过是一暂时的危险，而对于我们的主要危险，仍旧是北方的蒋介石，虽然他暂时比较的不甚积极，因此方面军至少是第一军团与第五军团的两个独立团，必须在七、八两个月继续执行计划，夺取第一、第二阶段所给的任务。我们的相当目的在：甲、扰乱或袭击那里的敌人，切断那里敌人联系；乙、取得并保持吉水，在这里建立侧面的根据地，他们当蒋介石开始进攻，或当我们进到计划中第三阶段时，应付一切的事变，消灭敌人的二十七师。在这方面应该督促红十六军向吉水、新淦之间的赣江行动。

二、比方我们来看广东对于我们的危险，假若照我们前次电报所提议，不迟的进行反攻，以模范师及游击队向寻乌外地

威胁，以便从后方决战，继续进攻安远，同时以便回师进攻武平，抵抗十九路军、掩护模范师的行动，则广东敌人初步胜利，是不会成功的。瑞金、会昌、雩都三角区域，仅仅进行防卫的步骤，是不能够应付目前的形势，而同时却用较强的力量，由上述的区域向边境进攻，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种行动，不仅不能使广东的进攻平静下去，恰恰相反，这将使他更加积极。除上述的步骤以外，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只能同意暂时扩大三军团在第一阶段的任务，三军团应该从清流东南向连城扩大进攻，以便掩护我南方力量，反对十九路军的作战。并以威迫闽南的敌人，放弃他们的继续进攻瑞金的企图。三军团在他援助了向武平行动的三十四师以后，应在八月五日以前，再回转北方，以便完成第一、二阶段中原来规定的任务。三军团在自己的主力向连城扩大进攻之时，更应以小的队伍，消灭那些向永安，沙县退却的敌人。

三、当三军团还没有在八月初重新转向北方进攻的时候，七军团不应与敌人有大规模的冲突。这时他的任务是：甲、如太宁尚未取得，则应取得之；乙、向太宁之北威胁，以便消灭一部分与我兴国力量作战的敌人。在八月初，应以小的部队，企图取得将乐与顺昌之间的金溪北岸，以便在三军团来到的时候容易渡河。

四、兴国的力量应以赤卫军支持一月至多两月，如万不得已须在此时以前躲避敌人的退却，则资、溪、邵是他唯一的方向，以便在此等候三军团的到来。

五、假如五军团目前在北方不甚忙碌，我们建议：除两个独立团外，将他移至兴国、雩都，以备广东敌人从信丰、赣州开始进攻的时候。应付紧张事变，同时亦如北方第一军团之后备军，这样利用可给少共国际师一些干部，以便加紧这一师的

训练，并使他及早完成少共国际师，在八月初可以执行警卫清流、归化的任务，并向着这里继续完成他的训练。在三军团将要离开清流、归化区域，转向北方的时候，少共国际师应防卫以上的区域，反对新的敌人进攻，因此少共国际师，在达到这些地方时候，即应建筑堡垒工事。

六、你们可以从这一力量的分配上了解我们的，定下了分配的原则，就算在八月下半月北方的敌人开始进攻，我们也有方法抵御他。总之，在我们一切的行动中，必须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我们再一次着重指出：今天广东进攻的危险，并不能成为移动方面军保卫首都的理由，因为方面军的进攻无论如何，为时尚早，企图这样想，只有造成着开始改变原来计划及早进攻我们的结果，因此不要以暂时危险而转移你们路线。虽然这一危险是很严重的，而应向前看到八月和九月，这确是我们前面的困难时期，请你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根据一个计划，来改善我们的环境。

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四日)

张 闻 天

—

自从党在苏区提出了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以来，差不多已有半年了，经过了党的领导机关与党的积极干部的努力，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得到很大的成绩，如像江西党在红五月中所得到的光荣的成绩，当然和江西省委以及个别县委领导方式的转变不能分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新的领导方式的转变，主要的还只限于省委与个别的县委，一般的县委以及县委以下的组织，在转变领导方式方面的成绩，还是非常不够的。

许多同志对于新的领导方式的了解，还是非常不够。他们以为新的领导方式就是要求党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坐在机关里不出去，在县委（这里举县委为例吧）之下，多找几个巡视员，把各部工作人员加多起来，多开会，多讨论问题，这似乎就是新的领导方式！以至发生这样有趣的事情，就是县委书记以及各部干事坐在机关里不知道做什么，只好睡觉或算伙食账。县

* 这是张闻天《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文的第三、四部分，分别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和九月二十四日，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和九月三十日出版的《斗争》第二十、二十八期。

委的议事日程上，天天开会讨论，“从苏维埃工作”一直讨论到“群众工作”，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所要讨论的“群众工作”究竟是什么？（如新泉县委六月内的议事日程）

这当然不是新的领导方式，而是对于新的领导方式的讽刺。像我在以前关于新的领导方式那两篇文章中所说的，新的领导方式的目的，是在加强党的领导，使党真正能够具体的实际的领导下级党部，领导机关内的分工与集体，建立各部工作与巡视制度等等，不过是新的领导方式的“必要的基础”与前提，而并不是目的。

新的领导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现，不是去看这个县委的书记是不是在家，各部工作人员是多是少，有无开会的议事日程等等，而是要看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要看党是否能灵敏的反映下面的群众情形，很迅速的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响应党的每一号召。简单的说，新的领导方式的目的，是在使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能够起它的核心作用，是在使党变成领导最广大群众的党。所以说到新的领导方式，必然包含有党与群众的关系与党怎样领导群众的问题。这是新的领导方式的基本内容。

官僚主义的旧的领导方法是脱离群众的，命令群众的，新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是同群众在一起的，说服群众的，领导群众的，我这次所要说的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因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脱离群众的，所以他动员的主要方法就是命令。这种命令主义，尤其在苏区党内特别发展。在这里，政权是在我们手里，这更便于官僚主义者依赖政权去达到他们的目的。比如，在扩大红军工作中，强迫命令，是常见的事，如若谁一次开了小差，那就非捆绑起来不可。退还公债，常常发生摊派与命令的现象。这种命令主义在党的领导

者与党员同志中间也是常常发生的。曾经为了要求支部同志报名当红军，支部书记将支部同志整晚关在会场上不放的这种奇怪事情。甚至像工会这样的民主的群众的组织，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如像以国家保卫局来恐吓群众的话，在全总执行局的机关报上曾经不只一次的发现。

这种现象，是不能一刻容许的。斯大林同志说得好：“党的权威，是依靠工人阶级的信仰来维持的。工人阶级的信仰，是不能以武力获得的。因为用武力去取得信仰，反而失掉了信仰”。（列宁主义概论一六六页）

拿扩大红军做我们的例子吧。要动员大批群众加入红军，只有说服群众的方法。如若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我们不但不能扩大红军，而且会使群众登山，反对我们。最近各县扩大红军特别有成绩的地方，即是能经过群众来动员，用宣传鼓动的方法去说服群众加入红军的地方。那些想用强迫命令来扩大红军的地方，都宣告了破产。在其他任何工作上都是这样，如若我们党想用强迫命令的方法，使群众执行我们党的每一决定与每一口号，那我们党决不会在群众中得到任何信仰。

斯大林同志说：“党必须天天得到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仰，党的策略，党的行动，必须得到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命令群众，而要说服群众，帮助群众用他们自己的经验，能够体验出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党必定要作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先锋与导师。”（同书一六八页）

但是我们的党所以能够说服群众，使群众执行我们的路线，因为我们的党有着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策略。因为我们党的每一决定，每一口号，都是为了群众切身的利益。

当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虽是我们党所提出的口号或决定是正确的，所代表的是群众本身的利益，但是一部分群众还

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口号或决定。比如关于总同盟罢工的问题。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总同盟罢工在我们党看来，是有害的斗争方法，因此我们党反对在苏维埃政权下进行总同盟罢工。但是如若工人群众不管我们党的意见，而举行了总同盟罢工，那时我们党能否利用武力去对付工人，同样不能够。我们在这里，还是只能向工人们解释他们的举动的错误，并帮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去了解党的政策的正确。这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是这样。斯大林同志说得好：

“我们现在假设因为工人阶级对于政治的盲昧，党的政策虽然大体正确，却不能引起大多数人的信仰与拥护。让我们再假设，因为时机没有成熟，党还不能够使工人阶级认识出党的政策的健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党是否能固执他的行动，勉强群众去行动呢？决定不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假若党要领导得很好，一定要知道怎样去等候，等候群众相信了党的政策的健全，并且一定要帮助群众用自己的体验去认识。”（同书一七七〇页）

但是如若我们党自己犯了错误，如若党与群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党的政策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党能够不顾一切而坚持自己的错误吗？当然不能够的。比如过去中央苏区的党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以致使群众对于党发生了恐怖，使群众的利益与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那时我们如若不顾一切而继续蛮干下去的时候，我们的党还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吗？结果必然是群众离开党，或甚至起来反对党。如在扩大红军中间如若我们完全采用强迫命令的方法，那结果必然是群众的登山，群众的反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如果还要做群众的领导者，那他必须重新考虑他的政策，修改他的政策，承认自己的错误，如像中

央苏区的党后来关于肃反问题所做的那样。

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中讨论到废止强迫征收而采用新经济政策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绝对的不能禁止群众发表一切的意见，我们必须诚恳地承认农民已经不满意我们建立的系统，而且已经不能再忍受了。这是没有疑义的。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意见，表示得十分明显了。我们已经违反着广大劳动群众的愿望。我们一定要顾及群众的愿望，而且毫不固执地说：让我们从新考虑这个问题吧。”（列宁全集十八卷第一册，一三八页）

总之，在任何情形之下，党决不能脱离群众，党必须同群众在一起，依靠在群众的身上，去完成党所提出的正确的任务。这里党对于群众的最主要的方法，便是说服！只有党说服了群众的最大多数，党的领导者的资格才能得到保障。

但是这个并不是禁止一切强迫的意思。比如我们在动员整团整师加入红军的工作中，当然免不了有少数不愿意加入红军的分子，或加入了而又开小差的分子，对于这些分子我们是并不禁止采用强迫方法的。斯大林同志说：“当这种强迫是根据于大多数劳苦群众的信从的时候，当党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的时候，强迫的方法是可以用的。”（同书，一八〇页）但是在这里同样的，首先是在说服大多数，即整团整师的大多数，加入红军，然后对于小部分采取群众的压力，使之跟着加入红军。

我们党内两条战线的主要任务之一，也即是实现党对于群众的领导权。右倾机会主义者，往往落后于群众的革命情绪与革命行动，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与不信任，以致做了群众的尾巴，失去了领导者的资格，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往往以革命的“左”的词句，脱离了现在的实际情形，以致脱离了群众，同样的，使党失去了领导者的资格。而党在任何时候不能

同群众对立，而须时时刻刻是群众的领导者。

但是要使我们党真正能够变为群众的领导者，我们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斯大林同志说得好：

“党一定要洗耳静听群众的呼声，留心群众革命的情绪，研究群众斗争的实质，细心考察他们的政策是否健全——因此不只要教训群众，还要跟群众学习。”（同书一六八页）

每一个官僚主义者照例是不耐烦去倾听群众的呼声的，他们不管群众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他们总是把党所提出的任务，机械的命令群众去执行。如果群众不执行时，他们就骂群众“悲观失望”，“太平享乐”，或者说“群众落后”等以掩盖自己对于领导群众的破产。比如我们自己党的支部会议开不成，官僚主义者只知道骂支部同志不好，而从没有去研究支部同志不到会的原因，同个别支部同志谈话，了解他们的一切困难与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从没有去研究党的某一正确任务不能执行的原因与如何使群众来执行的方法。

党常常规定了正确的策略与口号，但是在实际环境中如何使这一策略与口号实现出来，常常是党的领导机关所不能完全预料到的。群众在为了党的策略与口号而斗争中，常常能够创造出许多实现党的策略与口号的新的具体方式与方法。比如党提出了“动员所有模范队，模范少队，整营整团加入红军”的口号，兴国的同志以及兴国的群众首先创造出了实现这一口号的新的形式与新的方法，动员了整个兴国师加入了红军。这种群众创造的新的方法与形式，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表现的非常丰富，我们党的领导者在这里的任务是在立刻抓住这种新的方法与形式，研究这种方法与形式，跟群众去学习，以便利用这种新的方法与形式，使我们能更好的去领导群众。

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做的非常不够。我们大家都说，江西兴国的工作，福建才溪区的工作是中央苏区最好的。但是他们好在那里，他们用了何种方式与何种方法领导了群众，我们就很少知道。一直到最近，江西省委才很迅速的抓住了兴国模范师加入红军的经验，把他运用到其他各县，使扩大红军的工作在江西得到空前伟大的成绩。在其他各种方面，我们也应从这样机警的迅速的跟群众学习。

只有官僚主义者才会自高自大，以为他所决定的办法是天下最完满的办法，群众只要依照他的命令做去，那就是什么事都会好起来。标本的例子是过去全总执行局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这些同志根本不管什么企业，什么对象，什么地方，他只是把劳动法上的条文照抄一顿，再加上一些千篇一律的条文，就算完事，以致发生这样可笑的事，在学徒的合同上，也写上成工八小时，同工同酬等条文，在木船工人的合同上，写上房内需用石灰水天天洒等条文，结果，这些合同大都是没有人去实行的。这些合同的订立自然会使群众失去对于工会领导机关的信仰。

我们的党是领导群众的党，我们的党在苏区是统治的党，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党。因此，我们特别应该小心谨慎去领导群众的斗争，使党的策略带有更多的弹性，以便能够活泼的运用到各种实际环境中去，容纳群众的最大的创造性，并发挥这种创造性到最高限度。斯大林同志说得好：

“现在正是群众的政治行动高涨的时期，党特别要时时留心注意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而且对于党的政策要格外地小心，特别使他表现弹性，而且现在假若共产党都是独断独行者，便格外容易妨害党对于群众的领导。”（同书，一八八页）

那种以为党是超于一切的，党只能命令群众，党不必注意群众的意见，党员有享受各种自私自利的特权的观点，对于党的领导是极端有害的。这种观点，只能造成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不信任。

不要忘记列宁同志在联共十一次党大会上所说的有价值的话：

“在群众之中，共产党不过如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所以除非我们正确地代表群众的意识，我们就不能管理。因为不然，共产党便不能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便不能领导群众，于是整个机器便会破碎了。”

细心的，耐烦的去说服群众，正确的去代表群众的意识，负责的谨慎的去领导群众：这就是我们新的领导方式的主要内容。

二

在《斗争》二十期上我说到我们领导群众的主要方法是在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我们的主张的正确，使群众执行我们党所提出的每一任务。

从许多党部的文件上以及许多同志的言论上，已经可以看出关于说服群众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一般同志的注意，反对强迫命令的声浪，是更加叫喊得响亮了。

虽是这样，但是强迫命令的方法，依然到处存在。“反对强迫命令”，许多还只是在党的文件上，同志的口头上。在实际工作中的显著的进步，还是没有看到。

请问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是在于我们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没有群众的宣传鼓动，我们就没有法子去说服群众，没有法子说服群众，那结果还是只有强迫命令之一法。

在宣传鼓动方面，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带有极浓厚的刻板性与一般性。我们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总是那一套我们所说得烂熟的老话，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起到扩大红军，经济动员止。虽是在最近，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宣传鼓动的形式与内容方面有了微弱的转变，但是对于怎样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是没有清楚的了解，因此我们不能依照一定的原则去转变我们的工作。

拿江西《省委通讯》第二十七期上所发表的“八一宣传工作的总结”来说吧，这里我们看到许多关于“木标语”、“竹标语”、“壁标语”、“纸标语”等等赤裸裸的数目字，但是对于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内容，那我们还是没有法子知道的。譬如这里说到在“八一纪念宣传动员比较充分，如宣传队普遍有系统的建立和训练，宣传品数量上的增加与方式的改善，均有了进步。”然而到底对于这些宣传队的训练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出去宣传的，群众是否了解或满意他们的宣传，在宣传中有什么经验，以及宣传队应该如何改善工作，那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关于宣传品的形式与内容也是如此。对于我们同志重要的，只要有宣传品发出，至于这些宣传品有没有人看，要得要不得，那就可不管了。

下级党部宣传工作的报告上，也是拿这些数目字来表示他们工作的优劣，而上级党部也拿这些数目字来决定下级党部工作的优劣。大家这样习惯了，至于在这些数目字下到底有什么内容，如何改善它们的内容，那是大家所不管的。

这是宣传鼓动工作方面恶劣的传统。要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同这种传统做坚决的斗争。

要使我们宣传鼓动工作，变成活泼的具体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问题，实际上即是怎样去接近群众，怎样开始向群众说话，怎样使群众相信我们所说的，而且能够执行我们的任务的问题。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必须具体了解我们宣传鼓动的对象。我们在开始宣传鼓动时，必须知道听我们讲话的是工人、农民、红色战士或是城市贫民，而且也应该知道他们的文化水平与思想上准备的程度。同工人讲话我们是一个样子，同农民讲话，我们应该又是一个样子。而且在工人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在农民中也有不同的阶层，因此对这种工人或农民讲话是这样，对别种工人或农民讲话又是另一个样子。千篇一律的宣传鼓动，是不会发生什么好的效果的。《真理报》的社论曾经这样说过：

“人们按照一定的样本，标准，公式去做鼓动工作。人们不是随地都会应付个别工人，女工，农夫，农妇。在鼓动工作中，难道人们不是往往把某企业中一切工人都看作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即同样接受每句话，每个论据，每个观点的整体吗？然而有用政治鼓动之实质，却在于把这个鼓动传达到每群人中间去，使它能为每个工人所了解，从他的知识程度出发，从他对于社会生活的某方面，对于某些问题的兴趣出发。”（斗争第四期）

我们现在的宣传鼓动工作，却是把所有的人都看做一个模型里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对于他们说同样的话，要求他们同样的接受我们的主张。要“把这个鼓动传达到每群人中间去，使它能为每个工人所了解”，像《真理报》所讲的，当然是没有可能的。

其次，我们对于宣传鼓动的对象的了解也不是一般的。比

如，我们知道我们宣传鼓动的对象是工人，甚至某处的某一种工人，如韩江的木船工人，这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绪、兴趣与要求。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应该从他们的切身问题开始。从这些他们有兴趣的，懂得的，要求得到解决的问题说起，把这些问题紧密的同我所要达到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那群众不但会了解我们所说的，而且会执行我们所提出的任务。

比如拿我们对于一部分失业的木船工人做扩大红军的宣传鼓动来说吧。如若我们一开始就说，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开始了对于我们苏维埃与红军的五次“围剿”，所以我们每一个工农分子应该加入红军，去回答敌人的五次“围剿”，你们木船工人就应该报名当红军，当红军是最光荣的。这种宣传鼓动，我想一定得不到很好的成绩。木船工人听了这种宣传鼓动，当然不会清楚了解，不会自动的积极的报名当红军。但是如若我们从他们的失业问题讲起，说明他们失业的原因，怎样才能根本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把加入红军与打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同根本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密切的联系起来，那木船工人就会了解我们所说的，就会自动的积极的报名加入红军。

把群众的切身的问题，同党的基本口号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布尔什维克动员群众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过去宣传鼓动工作的错误，就在于不知道应用这一原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一些基本政治口号不断的叫喊，而不知道如何使这些口号变成群众自身的，群众所深刻了解的活跃的有血肉的口号。

要达到这一目的，并不是容易的事，这与我们整个领导方式的转变不能分开的。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领导之下，我们决不会知道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这一地方的人或那一地方的人的生活、情绪、兴趣与要求。要了解这么多问题必须要

有最具体的领导，必须我们有非常灵敏的阶级的感觉，感觉到群众每一脉搏的跳动。

一千零一次的背诵党的基本口号，是完全不够的。这里还要把这些口号具体化，把这些口号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中执行起来。这就要求我们考察、研究、探索、猜摩和熟知各种人群的生活与要求的特点，把我们的总的政治口号与路线同群众这些日常的甚至细小的生活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我们以后就要拿这一标准去考察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优劣，并且以后我们的宣传工作的转变也应该向着这个主要方向去进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变为真正群众的宣传鼓动，变为能够说服群众的宣传鼓动。（关于宣传鼓动的其他问题，将专文讨论）

第二、要说服群众，除了群众的宣传鼓动之外，还应当在实际上来解决群众中所发生许多困难问题。

我们实行了土地法与劳动法，我们大大的改良了工农群众的生活，我们是已经满足了群众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的进攻与新的封锁，在群众中造成了新的痛苦与困难。如像食盐、布匹的缺乏，苏区生产品的不能出口，都会使群众的生活恶化。此外，在群众日常的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像犁牛、工具、肥料、水利、种子等。我们都必须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群众相信我们是处处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斗争的。这种日常的坚苦工作，最容易取得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信仰，便于我们去说服他们来完成我们所提出的任务。

拿扩大红军来说吧。查田运动深入的区域，经济建设比较有成绩的区域，扩大红军也最有成绩，这已经是大家所知道的真理。再譬如经常红军家属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同样的，扩大

红军工作比较容易，进行归队运动也比较好。一切事实都证明，只有我们真正细心的了解群众的困难，耐心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斗争时，说服群众，动员群众工作，才能胜利的进行。

但是这一简单的真理，却不是为每一个我们的同志所了解的。有些同志当他们不能动员群众时，常常骂群众不好以至把强迫命令捆绑当为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然而他始终没有去想一下，不能动员群众的基本原因在哪里，为在大大改善群众的生活上做了什么艰苦的工作。有些地方发生这样的情形，为了要进行扩大红军的突击，我们组织了耕田队给红军家属耕田，但是红色战士出发前方后，我们就把这一工作冷淡下来。至于经常的解决红军家属所发生的一切困难问题，那更是说不上。这种情形，同样是不好的，改善群众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问题，这是我们的经常的中心的工作，而不简单是一个临时的突击工作。

只要一看我们各级党部的议事日程，我们就可知道我们每一次会议所讨论的，还大都是扩大红军，推销公债等，对于当地群众的某一具体的切身问题的讨论是很少的。近来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了转变，但这种转变还是异常不够。无疑的，有系统的改善群众的生活与完成党的基本任务中间的一致性，我们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第三、在每一宣传鼓动之后，在说服群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善于组织群众。首先在我们的动员工作中，我们往往把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分离开来。我们在宣传鼓动之后，不知道立刻组织群众，做组织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利用宣传鼓动工作，来组织群众。比如关于推销公债的问题，我们召集了群众会议做了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不知道当场就由群众自动认购公债的

数目，并且经过群众组织某乡的推销公债委员会，经过这个委员会去更广泛的推销公债。或者我们不做任何宣传鼓动工作，而把群众关在会场上强迫他们购买，或者由一个同志拿了花名册挨户摊派。

其次，我们不知道经过不同的组织去组织群众，经过这些不同的组织去动员群众。比如我们的青年团，这是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的组织，我们应该经过青年团去组织最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然而，事实上青年团员的数量远落后于党，许多青年群众没有被吸收到青年团中去。如像在方面军中，青年占有所有红军数量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青年团却只占全青年群众的百分之二十五强。

显然的，我们是把许多不同的群众团体，也看做了和党一样的东西。我们在那里的工作方式也看做是第二党的工作方式，在青年团中这种第二党的工作方式依然存在。这种方式甚至在儿童团中也是存在着。此外，如像我们的互济会，我们的“反帝拥苏”，也往往不能清楚了解到他们特殊的性质与任务，以不同的立场与方法去组织群众。在“反帝拥苏”中讨论的是扩大红军，推销公债，在互济会中讨论的也是这一套。党提出创造工人师、少共国际师、互济会也照样提出创造“反对白色恐怖连”、“反帝拥苏”则提出创造“反帝拥苏连”。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作方式，到处都可看得到。至于怎样经过互济的反帝的立场去团结广大群众在它们的组织中，怎样应该适当的在他们的组织中去传达党的影响，执行党的任务，那就很少注意。正因为这样，许多群众组织，没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他们的会员许多是登门造册式拉来的，这些会员除了知道必须交纳“互济捐”、“反帝捐”外不知道为了什么要加入这样的组织。

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党内曾经发生过这种机会主义的

观点，说党应该取消这种群众组织，把我们的力量更能集中于党的工作，而不了解党正需要经过这些群众组织来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周围。

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党对于群众组织的领导还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或者是由我们同志去包办，把群众组织变成第二党，或者是根本不管。在许多县区的党，甚至放弃了对于苏维埃青年团与工会的领导。

我们现在大家认为动员整连整营整师的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是扩大红军的最好办法。然而我们对于赤少队的领导则是极端的忽视，所以在经过五、六、七三个月的动员之后，整批扩大红军的成绩，是非常的微弱。不整理与扩大赤少队，加强党对于少队的领导，不迅速的恢复模范队的组织，那动员整连整营的模范队去加入红军，岂不是纸上的空谈！

经过党团来领导各种群众组织，在我们同志中间还没有清楚的了解，甚至有些同志把苏维埃的党团，当做了党与团的代表，根本不知道党团是什么一回事。或者形式上组织了党团，根本就不起作用。正因为党还不能经过党团来加强党对于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各群众组织的工作的转变，还是没有达到应该有的程度。

最后，寻找出新的组织形式来动员群众，也是特别重要的。比如利用新战士去组织扩大红军的突击队，就是这样的例子。兴国的同志曾经创造了许多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的新方法。过去少先队动员整连整营少先队到前方去配合红军作战，这样来争取他们加入红军。这里，我们要极大的发展同志与群众的创造性，灵敏的抓住每一新的方式，来动员群众。一切呆板、固执、迟钝、墨守成规，都是新的动员群众方式的最大敌人。我们不但要知道如何发展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知道

如何组织这些群众的积极性。

因此，我们就说到最后的第四点，即是为了要能够很好动员群众，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过去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把这些经验来普遍的应用。

我看到不少我们的党部对于各种工作的检阅的报告。但是这些检阅照例的只是指出“政治动员不够”，“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不深入”，如若是关于红军的，那一定还要加上“对于扩大红军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充分的群众动员，强迫命令的方式非常严重”，“没有充分执行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等等，这样的—个“检阅”，就算了事。过了三个月于是又来这一套，又来重复一次过去所说的，有些同志甚至把一套话说的烂熟，所以在检阅工作时，他可以不听，他可以睡觉，但是轮到他讲话时，他却可以滔滔不绝，讲□□□两三点钟！这种“检阅”，当然对于工作具体帮助是很少的。

我们要使同志们知道如何不用强迫命令的方法，而能够动员群众，那简单的告诉他们不要强迫命令群众，而要去说服群众，是不够的。这一真理，就是我们重复它两三千遍，强迫命令的方法依然还是会存在下去。这里，对于我们下层同志的谩骂与责备，并不能改善事情的实质。这里需要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不断的以新的具体动员群众的办法，去告诉同志，详细的研究每一新的群众所创造出来的经验，去告诉同志如何来应用这一经验。

比如我们批评八月份扩大红军中犯了寒热病的错误，所以我们以后应该同这种寒热病的现象的斗争。这种批评，对于以后的工作不会有丝毫的帮助。因为这种批评是笼统的抽象的表面的批评，对于八月份实际的扩大红军的情形，没有丝毫的具体的分析与研究，因此不能真正了解扩大红军落后的真正原

因，来帮助以后工作的转变。

就是拿兴国动员模范师整师加入红军的经验来说吧。这一经验，说来似乎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实际上，真正能够知道这一经验的，还是极少数中的少数。我们江西省委始终没有把这一经验，写成通俗的小册子，普遍的散布到全苏区去。至于研究这一经验，指出在这一经验中还有什么缺点，还有什么地方应该改良的，使这一经验与教训集合起来，供给各地党部，那更是没有看到。

许许多多我们下层的同志与群众所创造的宝贵的动员群众的经验，我们是白白的放过去了。我们有一些同志只满足于背诵圣经式的千篇一律的自我批评，而对于活生生的新鲜的经验，则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这种倾向，是使我们动员群众工作不能迅速前进的极大原因。

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应该成为我们党改善我们对于群众的领导方式的有力的武器。这种自我批评应该具体分析我们在领导群众中的经验，指出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使我们以后能够更好的领导群众。这种自我批评有它的时间性、特殊性与连续性。它一层深一层的向着取得领导群众的艺术的方向前进。自我批评的价值也就是在这里。

或者是忏悔式的背诵圣经式的自我批评，或者是没有自我批评。许多地方的负责同志，把动员红军、推销公债中所发生的严重现象都推在下层同志身上，似乎他自己是丝毫也不负责的。他从没有想过，他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中除了一般的空洞的指示外，到底做了什么具体的工作，到底给下面同志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办法。这类缺乏自我批评的现象同样是妨害我们改善我们的动员群众工作的。

至于张如心同志在《红校斗争》第七、第八期上的“自我

批评”，那只能说是张如心同志的流水账，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把每一新的经验，每一具体的动员群众的办法告诉同志，发挥同志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学习领导群众艺术的主要方法之一。

不疲倦的，顽强的，坚持的在上面我们所说的几方面努力，那我们可以断定我们在领导群众的艺术上，必然会有迅速的进步。我们必定能够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参加战争，争取五次战争的完全胜利！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对 目前作战部署与战略问题的指示 给朱德等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七月)

朱周王宪^{〔1〕}：

(一) 虽然由于你们过去给敌人的打击，及我十一、十二、二十二军向敌人作有效袭击之结果，使敌人行动迟疑退后，而造成了相当有利于我们的形势，但我们认为在目前跟踪敌人，在过崇仁、抚州是不适宜的。

第一，敌人在精神上虽已动摇，但我们绝对不能过低估计敌人力量人数，技术、距离之密切、守备队之坚强等。

第二，依照上述方面，我们将把自己对于决定胜负的战争中，而无可能取得策略上各个击破非常有利之机会。

(二) 根据上面理由，方面军必须无迟疑的离开崇仁、乐安、宜黄的区域。现有两个可能的方面，值得我们选择：

(1) 与敌人切断，向宜黄、乐安之间南退，以便转入永丰区域，在五月开始新的作战。

(2) 进攻公陂集中的敌人力量，以便我主力能自由集中到永丰的东南，而进行同样的新作战。

(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各军及第四、第五独立团的活动，都应为我们的目的而活动，并继续

下去，要选择进攻公陂。

（四）完全依照你们目前估计，如何应付堡垒以外一三师敌人的突击，即我们所想到敌人第五师、九十师、第一四师，一点时间不能空费，向西前进，撇开乐安，用力的打破一切进攻中的障碍。

（五）从永丰区域开始新的作战，用意即在：

（1）牵制乐安以南的敌人任何的行动。

（2）乘时取得有备的地位，突破敌人赣江的防线，但此第二而且主要的目标，是完全依照于最近在赣江东岸所给与保证的打击。

（六）为将来密切的与红军主力合作，十六军应派独立的队伍向赣江进展，以便切断安福以北赣江沿岸的敌人联络，我八军必须在安福以南进行同样的任务，牵制从湖南增援安福的敌人。

（七）立刻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同时希望立刻详细告诉福建战线上敌我的力量，以及模范师的情形。

告诉你们，我们根据此电，任何误解都可清楚。国际电内容如下：

（一）我们对于军事策略的建议，绝不能当作对于在军事的行动，纯粹采取防卫路线的提议。

（二）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也应开展进攻的作战，应利用最有效的援其目的，不仅在维持我们主要的根据地，目前任务同时应在巩固和联结我们的苏维埃区域，但须避免大的损失与失败。

中 央 局

注 释

〔1〕指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

苏区团的组织状况与我们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

何克全

一 组织发展的状况

目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团的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因为解决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或者革命的出路，正依靠着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巩固的程度”。在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与苏维埃革命发展的前面，提出一个绝对的问题：或者是让卖国的国民党继续统治下去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或者是苏维埃胜利使中国独立解放。解决中国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的殖民地的或者苏维埃的出路上，依靠着我们的组织的巩固的程度。

从一九三二年来，在全中国都有极新的加入共产党与共青团队伍的潮流。从是年“九一八入团号召”到一九三三年“一二八入团号召”，上海的团员有十倍的增长，在“一二八号召”中河北的团有二倍的增长，满洲的团有一倍的增长，在厦门的团也有一倍以上的增长。这一事实指明，在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在全中国存在着革命危机更猛烈的向前发展与民众革命性的极度增涨。

虽然国民党用着禽兽的白色恐怖，企图来割断共产党与群

众的关系，但是并不能去阻止群众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潮流。被这一潮流所冲洗出的叛徒正在那里诅咒“共产党的崩溃”、“共产青年团的坍台”，然而冲洗的叛徒，却增加成千成万的我们的新的力量。

在苏区内这一年以来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又是怎样？

我这里手下没有全中国各苏区团的组织状况的材料和统计，这是非常之可惜的事情。我手下只有江西和福建两省的比较详细的组织材料，以及闽赣和浙赣两省不完全的十分不完全的材料，然而根据这些材料，已经能够帮助我们去研究苏区团的组织状况。

先来看我们组织发展的趋向。

在春季冲锋季的时候（一月到四月），在江西发展了五千人（包括建黎泰）、在福建发展了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在江西有五万人左右，在福建有五千人，在春季冲锋季时江西、福建两省总共有五万五千人到六万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决定了红五月的人团号召。

在红五月中，在江西（建黎泰除外）发展了一万四千五百零一个，在福建发展了三千九百五十七个。当然红五月发展的速度是比春天冲锋季快了一倍半以上。如果冲锋季是三个月，红五月是一个月，那么应当是快了四五倍。

现在我们拿江西各县来看。那我们在红五月的人团号召中，根据兴国、胜利、赣县、雩都、公略、永丰、瑞金、石城、广昌、宜黄、乐安、信丰，十二个县总共征收了一万〇五千〇二个，内占青工、雇农一千〇六十三个，即是占百分之十一点一的工人成分。

根据胜利、赣县、公略、永丰、瑞金、石城、广昌、乐安、信丰，九个县总共征收了八千八百四十九个，内占贫农六

千七百二十五个，即是占百分之七十六的贫农成分。

第二个事实告诉我们，根据兴国等十二个县团员总数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个，内占青工、雇农四千三百四十三人，即是占百分之十二弱的工人成分。

根据胜利、赣县、瑞金、寻乌、宜黄、信丰六县总共有团员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七个，内占贫农一万四千零七十一人，即是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七的贫农成分。

可惜这一统计只告诉我们红五月征收的统计和各县总的统计，没有告诉我们在红五月以前原有的数目，因此我们从这个表中不能够去研究苏区团流动的现象，然而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着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能寻找另外的材料。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在江西各县的报告中实在是很难找到。在会昌的报告中是有这样的材料，但是会昌的工作一般的讲来是落后的区域，很难拿他作为评定江西整个工作的标准，没有办法，我们只得拿会昌的材料作为一个参考的材料。

在会昌进行春季冲锋季以前，共有团员一千九百三十六个，在一月份发展了一百二十八个，在二月份发展了一百六十五个，到三月份增加上一二月的共发展了五百人，在四月发展二百四十七个，在五月发展一千一百六十七名。

照这样的情形看来，到红五月止会昌应有三千八百三十三个，但实际现在三千六百五十一个，流动的共有一百七十九个。

在一月份团员到红军中去的只有四个，二月份有三十七个，四月份三十二个，五月份十一个，总共八十四到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去了，除八十四到红军中了还有九十五个流动的，这里的事实说明江西的团流动还在存在着。

再拿公略的情形来看。

在一月份公略流动的情形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在一月份发展了一百一十三个，动员到红军中去有三十九个，原有团员是四千三百六十八个，在总数量上只增加三个，即四千三百七十一一个。

即使就是把四月份的不计算在内，也应有五千五百零四个，除去到红军中的共有九十六个（也是没有四月份的统计）外，也应有五千三百零八，但是红五月征收的总结，公略总共只有团员五千零七十七个，流动的还有二百二十一个。公略今年总共发展有一千一百三十六个，流动的现象在公略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我们想，根据这些零碎的材料，已经足够说明江西团流动的存在，而且是很严重的。

同样在江西总的统计表中没有告诉我们落后于党的组织的状况，使我们能够更加具体的去提出赶上党超过党的任务。在会昌，在冲锋季时还比党少三分之一，在公略也是在这个时候比党少一千九百多个。

在春季冲锋季以前，福建团的成分根据汀州市五县的统计，青工占百分之十六弱，根据长汀等四县的统计，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一强，经过春季冲锋季后发展了一千一百五十二个。

经过冲锋季后在汀州市等五县青工的成分，由百分之十六增加到百分之十八。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动呢？我想在汀州市入团号召的成功应当是这一变动的主要原因。

进行红五月的人团号召，在福建征收了三千五百九十七个。原有团员五千三百二十二，加上红五月发展的三千九百五十七，实有的团员应当为九千二百七十九个，但是现在只实有八千六百一十五个，就是六百六十四个团员流动了。

这里还须要说明的在冲锋季前原有团员四千二百个，加上

冲锋季发展的一千一百五十三个应当为五千三百五十三人，但是在红五月前原有的团员只有五千三百二十二个，这里没有把四月份的发展计算在内，还有三十一个流动。福建团内的流动现象也还是存在着。如果拿个别县来看，那么流动的现象更是惊人的。如长汀据春天冲锋季以前的统计有团员二千九百一十八人，加上冲锋季内发展的四百七十个应当为三千三百八十个，但是在红五月前的统计为一千八百八十六个，这一时期内流动了一千五百零二个。应当说明的是在红五月前后新成立了汀东特委大部分是由长汀划过来的，除了汀东的四百二十七个也是流动了一千零七十五个。又如宁化在冲锋季前有五百三十四人，冲锋季中发展四百一十四人，红五月中发展八百人，应当为一千七百四十人，但现在发展有团员一千四百四十九人，流动了二百九十九人。

长汀冲锋季动员去当红军的团员四百零八人，在红五月中一百八十二人，总共动员了五百九十个去当红军，从一千零七十五人中除去五百九十个当红军的外还流动了四百八十五人。宁化在冲锋季中动员了七十六人到红军中去，在红五月动员了八十七人，从二百九十九人中除去一百六十三人，也是流动了一百三十六人。流动的现象还有非常之严重的存在着。

现在我来说福建红五月后总结的组织状况，我的结论是青工占百分之十二弱，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十六。

如果单拿红军中团的发展上来讲，在这一时期内也是非常之不能使人满意的。当然我们丝毫不能抹杀红军团的质量的优良，政治水平比一般团员要高，它是成为苏区团的模范队，但是团的发展无论如何是迟缓的。在春季冲锋季中，在方面军只发展了一千二百多个，在一月份的统计是有团员四千九百七十个，团员的数量只占红军中青年的百分之一。在青年占绝对多

数的红军部队中，团员在数量上还是落后于党，只有在某部队的战斗员中团有时是超过党的。

江西、福建两省组织状况总的图画：总共有团员六万一千六百零一个；博生县的没有统计，我们估计博生县有六千人，那么就有六万七千六百零六个。但是闽赣省内的没有计算在内。然而建黎泰划归闽赣省委对于江西团员的数量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黎川在冲锋季前只有十五个团员，冲锋季中发展一百八十四个；泰宁原有一百零八个，冲锋季中发展二百零八十个；建宁在冲锋季时共有二百三十九个，总共只有九百四十八个团员，在红五月中才发展了九百九十个。增加了一倍的团员，这是闽赣的成功。

由总的数量上发展的曲线看来，江西、福建两省团的组织的增长是极端的迟缓，如果与上海团组织发展的速度来比较，那可以说江西、福建在这半年来组织的发展是在停滞的状态中。我想这样的估计对于苏区团半年来的组织的发展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事实完全不能指明苏区青年工农积极性的低落，或者是像有些机会主义者的说明“苏区青年怕加入团”。这种事实只能指明：苏区团在这一时期内对于革命发展中组织的意义估计的不够；对于解决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殖民地的或者是苏维埃的出路，依靠于我们组织发展和巩固的程度估计不够；还存在着立三路线对发展组织的自发论的残余——立三主义者以为我今天暴动，明天就可有几万几十万的党员不成什么问题，即使在苏区之内我们没有正确的组织，不去为着壮大我们的组织而斗争。希望我们的组织自发的会增长起来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永远不会有的。在中央局春季冲锋季的决议与报告大纲中都没有提到增长组织的问题，因此江西整个十八县的报告，没有一县讲发展组织的状况，虽然在苏区内我们

有着比上海完全不同的优越的条件。

从江西福建的材料中，这应当是我们的第一个结论。

苏区团的成分问题，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因为江西方面没有这样详细的材料，使我们可以去研究这时期团员成分变动的状况，据江西兴国、胜利、赣县、雩都、公略、永丰、瑞金、石城、广昌、宜黄、乐安、信丰十二个县共有青年工人和雇农团员四千三百四十三人，根据兴国、胜利、雩都、万太、石城、广昌、宜黄、乐安、信丰九个县的统计，加入工会的青工会员就有七千四百二十七人，如在兴国全县青工会员一千七百一十六人，又有未加入工会的一百二十八人，但是青工雇农团员有九百八十四人，只有一半的青工雇农加入团，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的来。但就在上面的事实已经足够的说明我们忽视无产阶级基础的巩固。

如果拿福建的情形来看，我们在冲锋季中我们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无产阶级成分，但是在红五月中减了百分之三十八的无产阶级成分。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不但在总的百分数上红五月中冲锋季减少百分之八，而且在绝对的数目上减少了三十九人，在绝对的百分数上减少了百分之七。当然在红五月中广大工人加入红军，在福建有四百个青工（但不完全都是团员）动员到红军中去了，这也是减少原因之一。然而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正确的组织政策，没有吸收新工人加入团来。福建方面，据我们手下的材料有青工会员二千八百六十一人（没有加入工会的我没有统计），吸收在团内的青工雇农只有八百五十三人，即就在工会的青工会员来讲也只有三分之一弱。如汀州有一百二十四个青工，五十七个木船青工，十四个苦力，刨烟十人，还有四百多失业学徒，汀州的团只有八十人

青工雇农。

机会主义者的胡说苏区没有青年工人，或者青年工人都加入了团，我想在上面这些事实面前完全粉碎了机会主义者的胡说。

我们的正确组织政策，并不像有些同志机械的提出为增加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的无产阶级成分斗争，这种机械的提法只能够一方面限制贫农与其他最受剥削的贫苦分子入团，另一方面，正是给机会主义说苏区没有工人的盾牌。

我们的门应向着什么人开，应怎样去开，我们上面这些事实已经尽够的告诉我们怎样去开门了。

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的组织政策，忽视无产阶级基础的巩固，今天苏区团的阶级成分还是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

从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应当得到第二个结论。

一件惊人的事，就是在苏区团内流动现象还是普遍的而且很大的程度存在着，很少人注意去与这种现象作斗争。在苏联的团内如果是失去一个团员，都要发出警号，找出原因和什么人应该负责；我们这里可以失去几十、几百甚至千数，但没有发出任何的警号，也没有任何人去寻找原因，也没有任何人负责。这种事件真奇怪！

在苏区团内还存在着的严重的流动现象，这是我们应当得到的第三个结论。

另一惊人的事，就是苏区的团在数量上很大的落后于党。少共国际支部拥有三百万团员的苏联列宁青年团，超过党的一倍，我们应当学习苏联的团一样超过党。

关于红五月入团号召的教训，党和团中央局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给红五月的征收运动的估计，是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

流产了的。这并不是说红五月的征收运动没有它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应当从胜利中去学得教训，同时我们应当从失败中去学得教训，使我们不去重复这样的失败。

怎样去解释红五月征收运动的失败？它的原因在哪里？在红五月中有三万以上的加入红军的新战士，有几十万参加经济动员、春耕夏排、借谷运动、退还公债、退还谷票、开垦荒地、查田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团的发展只有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八个，怎样去解释这一件事？是不是像有些同志的回答：“青年怕加入团”、“青年不愿意加入团”、“我们的门开了青年不进来？”我想这些同志的回答，不但不能解释红五月征收的失败，而且是对于青年的侮辱。红五月征收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存在着的团对于发展组织的意义的忽视没有完全的克服，在团内有些同志对于青年群众的不相信，对于青年的侮辱，以及严重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这是阻碍着红五月征收运动的进行。

现在我们来查看红五月发展的情形。在江西红五月中发展一万四千五百零一个（十八个县的统计），内中有七千八百八十三（十三个县的统计），是在“五一”“五卅”以及其他纪念中征收的。如果拿这十三个县红五月的发展为一万零一百六十八个，即是说百分之七十七是纪念会中征收来的。

如果我们拿个别的县或区来看，我们更可以知道这一问题的严重。

从赣县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从纪念日的发展占百分之八十二，从日常的发展中占百分之十八。我想这样的事情已经是惊人了，惊人的是日常没有发展。

从会昌发展的情形看，我们从纪念日中发展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二强，从日常发展的只有百分之八弱，在这种情形之下是

完全取消日常的发展工作。

这样的材料，我手下还有许多，我想已经够了。

从红五月的发展来看，在纪念日发展的占百分之七十，在日常中发展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九。

从这些事实中告诉我，在红五月中所采用征收团员方法，普遍的是会议进行，几个团员的负责同志或者是宣传队热烈的演说之后就是一番号召入团，会场上摆着一个摊，贴着报名处，接收报名和填表。这一个事实很明显的指明了没有执行中央局关于红五月征收团员的指示，没有把征收工作成为每个团员的日常工作，没有实现中央局所提出的应当在每个团员前面提出“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的任务。有许多地方的报告说：“关于每一个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的口号，我们是普遍的提出了，但是没有实现”。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们没有实现的原因。我想没有实现的原因，就是用纪念会上的征收代替了日常的征收。

没有把红五月的征收，变为每个同志的日常工作，这是红五月征收运动流产的主要原因。红五月征收运动的主要教训是在这里。

是否我们须要在会议上的报名式征收呢？当然是可以采用的，但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方法，尤其是不能用会议上的征收去代替日常的征收。

会议上的征收的好处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吸收大批的入团，但是它的坏处能够使更多的偶然的分子入团，增加团的流动现象。建筑在每个同志日常工作上，个人的负责介绍，可以减少上面的现象。提出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的任务，就是说要把征收的工作变为每个同志的日常工作。要实现每个同志介绍一个同志的任务，也只有把征收的工作放在每个

同志的日常工作中去。这是非常明显的真理。

红五月征收运动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于征收运动上的宣传鼓动之刻板性和平均主义。有些同志把青年看作一个整体的东西，想按照一定的样本、标准、公式去做鼓动，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应付个别的青年工人、学徒、牧童、雇农、女工、农妇以及文化程度政治教育之高低。在红五月中，征收工作中我们的鼓动往往是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这一公式。我们在许多口头的或书面的报告中听到同志说，我们宣传了团的主张，但是怎样去宣传了团的主张呢？有的是说：“加入团要当红军”、“加入团要做工作”、“加入团要做模范”、“加入团要开会”、“加入团要缴团费”，这样去宣传要别个加入团不但是错误，而且不会使别人了解的；结果我们的同志用这种公式去宣传，到处碰到了壁头。他们的回答：“我们不加入好了”。因为我们的同志不善于从他们切身的问题，他们所迫切需要知道的问题去向他们解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不善于利用每一个好的时机来鼓动青年与劳苦青年来赞助与加入共产青年团。我们的同志不善于去对付青年各阶层中的个别的活的人，我们的同志想用一個固定公式去对付一切的青年。

红五月征收失败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具体的领导，没有经常的检查工作，没有监督与帮助。在红五月中没有检查过一次，只是到了红五月总结时才作了一个结论。为什么在会议上的征收代替了日常的征收不能早的纠正，因为我们没有具体的领导，因为没有去检查工作。这是红五月失败的重要教训。

现在我们还是要来解答在红五月征收运动中的组织政策，因为这是我们在组织上的基本问题，因为没有组织问题上的正确政策，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是不能去执行我们的组织任

务的。

在上面的表中，从江西、福建的两省中的征收中，可以看到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没有正确的组织政策。在两省红五月征收的无产阶级的成分都占百分之十，在福建无产阶级的成分相对的与绝对的都是减少了。

在红五月运动中，有些地方提出“一切青年加入团”的口号，这是一方面模糊组织的阶级路线，另一方面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减低团的作用。在有些地方提出“贫苦工农加入团”的口号，这是模糊了我们的正确的组织政策，不了解我们首先而且最多要吸收的什么人，似乎我们吸收青工与吸收贫农没有不同的意义，似乎我们吸收贫农与中农也没有不同的意义。

这是对于红五月征收工作的几个重要教训。

二 在目前苏区内怎样去调剂成分

要使团能够完成目前的任务，要求最迅速的变为几倍大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的组织，包括广大的最受剥削的半无产阶级青年、贫农青年和觉悟的中农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要求最迅速的变为拥有几十万团员的组织。

最先而且最多要吸收的什么人？团应该最先而且最多吸收无产阶级的青年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团应该首先集中一切力量，用一切的可能，吸收苏维埃企业内的青工、小企业和商店的青工、手工业的青工学徒、农业青工牧童与运输木船苦力青工到自己的队伍内来，依据他的职业所在地建立起模范的支部，经过团的组织，能够使这些支部对于比较落后的和缺乏无产阶级成分的支部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在哪里？我们听到不少的这些理论：

“苏区没有青年”、“青工都加入了团”。我们先拿事实来看：虽然因为青工部的工作与团在工会中的活动非常之坏，没有整个苏区青工的统计，我们根据一些极不完整的统计，在公略、瑞金、博生、兴国、赣县、胜利、会昌、雩都、永丰、石城、乐安、万太十二县在六七两月内共有青工会员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七个，在福建据不完整的统计有青工会员有三千四百四十二个，即就在这不完整的统计已有将近二万的青工会员了。在福建只有八百五十三个工人团员，即是说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青工会员加入了团，还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没有加入团。这些事实完全很明显的指明无产阶级青年在哪里，说“苏区没有青工”、“青工都加入了团”完全不是事实。最可惜的是我们没有青工群众的统计，使我们不知道到底苏区内有多少青工。

我们的门应当开向工会的青工会员，开向一切的男女青工。

在调剂成分的问题上须要坚决的反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团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在军事上与政治上有决定意义的与战略上占着重要的地点，去建立团的强固的组织，这些地方我们应当使更广大的青工与最受剥削的分子，半无产阶级贫农和好的劳动的青年加入团。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观点到今还是存在。我们的同志以为在汀州市吸收一个团员与在长汀任何一个乡吸收一个团员没有差别，以为在东黄陂吸收一个团员与在博生其他地区没有区别，如汀州市红五月的征收只有河田区的三分之一。一般的来说，还没有一个城市的工作到了模范的地位：兴国城市的工作还落在上社区高兴区的后面，瑞金城市区的工作还落在武阳区九堡区的后面，即使汀州的工作在长汀县的模范内来讲也还落在红坊区的后面。过去我们回答为什么城市区的工作落后呢？很多人的意见都是说忽视城市工作，省县委所在

的地方工作愈是落后。这只能有一部分的真理，这一部分的真理是过去的领导方式，“机关锁了，天天在外面”。但是主要的还是因为城市工作的比较困难，需要更多的艰苦的工作。我们的同志逃避了这个困难，而向着比较容易的方向去发展。

然而不能抹煞城市工作的改善，这主要的是从汀州市的人团号召后，汀州的团由八十几个人变为了三百五十四个人以上，最近汀州市整连工人模范队加入红军，在博生城市工人的加入红军。

对于缺乏无产阶级青年成分的区域，我们调剂成分的方针又是怎样？在这些区域内必须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尽可能的达到将那里所有的无产阶级青年的分子都吸收到团内来。少共国际的指示是“在可能公开的地方，他的门应该开向一切男女青工”（少共国际纲领），“向着一切男女青工开门”是我们苏区团调剂成分的主要口号。

正确的调剂成分，加强团内无产阶级的基础，这并不是说可以允许一刻的对于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与中农青年的关门政策，这种政策是一刻不能容忍的，必须大量的来吸收最受剥削的、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与觉悟的中农青年入团。少共国际对于这方面的指示：团一方面维持着青年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一方面还是努力的吸收劳苦青年群众和其他的贫农青年，并且青年团也允许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和中农青年来加入队伍，只要他在工作中表现积极革命的就好了（少共国际纲领）。

少共国际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团吸收中农青年有下面特别的指示：“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当对于中农的策略是不但使之中立，而是与之联盟的时候，则团更可较广泛的吸收中农”（同上）。这样的指示，对于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下，我们对于中农的策略是采取坚决联盟。因此少共国际的这一指示，对

于我们苏区的团是适用的，而且很重要的。

过去我们在调剂成分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的政策。一方面是忽视无产阶级基础的巩固，如我们提出“一切青年加入团”、“贫苦工农青年加入团”；另一方面却限制其他劳苦青年的入团，如机械的提出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的无产阶级成分。如在兴国，全县只有一八四四个青工（据他们的统计，全县已有六九四一个团员）。如果机械的去调剂成分，就会限制其他劳苦青年的入团，对于他们关门。

三 与流动现象作斗争

流动现象在苏区团内还是很大，在有些情形之下，使我们的团没有任何增长。使苏区团发生流动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这些原因除了一般的原因（如支部工作的不能令人满意，对于新团员没有分配适当的工作与进行必要的教育）不说外，发生流动性的重要原因还是征收团员的方法，大部分的情形是在会议上进行的，没有日常的征收工作，关于这一点，在上面总结红五月征收运动的时候，已经详细的讲到。用在会议上的征收代替了日常的征收，这不仅是在红五月中发生过，而且春天冲锋季中也发生过。不把征收的工作放在日常的工作上去，要克服流动现象是没有可能的。

随着广大的加入团的潮流，必须开展广大的对新团员的教育工作与团的教育网。在红五月的征收工作并没有去加强对新同志的教育。可惜我们没有对红五月新团员教育的整个统计，只有个别区的材料，如在兴国方大区征收四十个团员，只有十一人受了支部的训练，在瑞金征收了一一八一人，只有五百人受过支部的训练。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对新团员的教育并没

有广大的开展起来。

因为缺乏对新团员教育与没有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我们常是听到同志们告诉他们说：“有群众说加入了也是一样工作，不加入也是一样工作”（万太、文圻的报告）。因为我们缺乏对他们的教育与没有分配适当的工作，使新团员感觉到他们加入以后与没有加入是没有什么区别，使他们很容易的流出去。

为着坚决的克服流动的现象，必须：（一）转变我们征收工作的方式，把征收的工作放在日常的工作上面去；（二）改善支部的工作，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发展团内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健全支部的生活；（三）发展对新团员的教育与团内的教育网。

四 为团的正确组织政策斗争

为群众的团的斗争，在全国的苏区内，在最近的期间，为着拥有百万团员的共产青年团而斗争，在中央苏区应当最迅速的把几万团员的团变为拥有几十万团员的团，应当立即来实施少共国际纲领上所指示的“一定要在数量上超过共产党”，应当立即来实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议“团员赶上党，超过党”的任务。

为布尔塞维克的团斗争，使团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团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加强，特别是干部的工人化。团必须在正确的调剂成分的政策之下，“团的门开向一切男女青工”，使拥有百万团员的团有着强固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能够使团真正的成为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团。

群众的团！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团！这就是我们组织政策

的旗帜的标帜。

我们在国际青年节的入团号召中，经过今年的国际青年节，使我们的团能够走上“群众的团，布尔塞维克的团”的道路上去！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六大以来》（下）刊印。

中共中央为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我们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日本帝国主义由于英法帝国主义的帮助，自占领了东三省热河，为长城以南平津以北建立了完全在它统治之下的“缓冲区域”之后，正在动员它的武装力量向着察哈尔、绥远前进，预备在“满洲国”之外创造它的“蒙古国”，并且计划如何建筑横贯西北大铁路，如何联合华北的各军阀建立第二个傀儡政府，来并吞华北的全部。

英法帝国主义的赞助日本，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目的。配合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英帝国主义实际上并吞了西藏、西康，并且正在利用四川军阀的内战，新疆回民的暴动，准备直接向四川、新疆进行武装的侵掠。法国帝国主义在云南、广西、贵州的殖民地政策也正在加紧的进行着。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强盗组织国际联盟之下，已组织了瓜分中国的专门机关。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同样是为了要把中国完全放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六十期。

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中国，把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是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而且全中国有六分之一的民众已经直接在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过着悲惨的奴隶生活。

在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全线进攻的前面，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但是一贯的不抵抗与投降、出卖，而且积极的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充当清道夫。它在东北强迫抗日的兵士停止反日战争，有计划的出卖东北义勇军，使义勇军走向失败。它在全国以白色恐怖的屠杀镇压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它签定了出卖东北四省的华北停战协定，在大连会议上正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与“满洲国”的外交官“握手言欢”，庆祝卖国的胜利。它协同日本与“满洲国”的军队，一致的向着察哈尔、绥远进攻，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早早完成“蒙古国”的创造。

同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更派出专使宋子文周游各帝国主义的首都，进行大规模拍卖中国计划。以出卖整个中国为条件，宋子文从美国取得二万万万元的棉麦借款，从英国取得一万万元的军械借款，从法国取得一千万元，德国取得二千万万元的借款，并从取得借款的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购买了大批的枪炮飞机以及一切杀人的新式利器。即以飞机而论，就有二百架以上的轰炸机与战斗机！

国民党以大规模的出卖中国，求得帝国主义财政上军械上与人力上的帮助创造了三十个新的主力师，不但不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是为了要帮助帝国主义屠杀民众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最大阻碍——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五次“围剿”，使帝国主义更能顺利的把中国完

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正因为这样，所以国民党一次二次三次以至四次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之下，集中一切力量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绝望的进攻，企图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肃清道路。然而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严重的惨败，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在全中国民众的拥护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他是不能战胜的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兴奋了全中国一切革命的民众，更清楚的告诉了全中国的民众，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

以蒋介石为匪魁的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必要的与主要的步骤。每一个工农民众，每一个革命分子，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这一“围剿”是在国民党签订华北停战协定之后，是在国民党在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了财力武器以及人力上的帮助之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是国民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当清道夫的最好的事实上的证明。为了帝国主义能够顺利的瓜分中国，国民党不惜使用一切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维埃区域。它利用飞机来轰炸，大批的毒瓦斯弹以及一切新式的杀人利器来屠杀苏区不愿再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之下生活的劳苦民众。它以经济的封锁，禁止苏区生产品的输出与非苏区油盐布匹等日用必需品的输入。它组织大批的武装队伍拔苏区的青苗，割苏区的谷子，毁坏苏区民众所有的一切房屋财产，企图这样来饿死冻死苏区数千万劳苦民众！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紧急

关头！在我们的前面有着绝对相反的两条道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中国的道路！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以空前的剥削与负担加在全中国民众的身上，吸尽你们所有的骨髓，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镇压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群众的反抗，调动了百万以上的军队向着苏维埃区域进行五次“围剿”，一切这些是为了要把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也正在动员全中国与全苏区的工农与一切革命的民众，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一“围剿”，是为了要彻底击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为要把全中国的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为了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

全中国的民众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开展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战争，进行群众集会、罢工、示威、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拍卖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五次“围剿”，反对中国地主资本家对于工农民众最残酷的剥削与白色恐怖的屠杀，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进攻，使中国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军阀，协同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民众，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直接作战，开展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全中国的民众们！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为苏维埃的中国而斗争呵！我们过去已经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扩大与巩固了中国革命的根据地，我们现在一定能够继续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取得中国革命更伟大的胜利！

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 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 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一) 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级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各省县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暂行条例另行规定。

(二) 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的职责，在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

(三) 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对于下级的组织及党员个人，认为有违反党章和决议及破坏党纪情弊发生时，得遵照党章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议决施以处分等。

(四) 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须报告中央批准执行，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之权属于同级委员会。

(五) 中央党务委员会及省县监察委员会在其职权内进行

工作时，得指挥下级监察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或党员执行一定的职务。

（六）中央党务委员会以党龄在五年以上的党员五人至七人组织之。

（七）中央党务委员会在全国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为议决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的最高机关，凡不服省县监察委员会或党务委员会的处分决议者得向中央党务委员会上诉。

（八）区一级暂不设立监察委员会，区委对其所属支部或党员个人，支部对属于该支部的党员，认为有处分之必要时须决定其处分。不服支部处分者得向区委上诉，不服区委处分者得向县监察委员会上诉。区委或支部收到申明不服处分的意见，无论是口头或书面的，即须转送县监察委员会。

（九）支部决议开除党员的党籍时，须遵守党章第六条的规定报告区委批准，区委仍须附具批准理由，报告县监察委员会备案。

（十）任职中央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主席的党员为党务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中共中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 “九一八”二周年纪念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九一八”二周年纪念迅速的到来了，必须以战斗的动员来进行以下的工作：

一、抓紧日本帝国主义两年来继续不断的对于满洲、热河和华北的工农劳苦群众与义勇军的残酷的压迫与屠杀，继续对于察哈尔积极的进攻，同时借口要求偿还西原借款，准备新的对中国的掠夺等等事实，广大的宣传、鼓动、组织群众的反日运动，进行一切反日的组织与斗争。

二、必须加紧开展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广大的进行武装群众与组织群众参加到义勇军中去运动，加强各地义勇军中的领导。河北党必须以战斗的动员革命的工人农民与反日的战士去加强扩大前线的抗日运动，满洲党应十百倍的努力去加强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中的领导与组织。同时河北与满洲党必须开展农民的一切抗捐抗税的运动，组织农民委员会，反抗政府的一切命令，发动游击战争，以扩大与加强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北方的党必须用一切力量在国民党军阀军队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以及“满洲国”的士兵中，号召与组织革命的士兵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在日本军队中亦应艰苦的进行哗变的工作。

三、“九一八”二周年纪念运动中，必须最高度的进行拥护世界反帝同盟的运动。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组织拥护世界反帝同盟，成立反帝同盟分会等工作，选出代表来参加欢迎代表与参加同盟的代表会议。河北与满洲党更应发动群众选出代表欢迎同盟代表到北方实地考察的运动。要使这一运动尖锐的与国民党欢迎李顿调查团与信赖国际联盟的无耻行动对立起来。这一运动，必须视为今年“九一八”中的一个中心运动。

四、国民党南京政府协同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以流血的战争来进攻察哈尔的武装的抗日力量与革命的群众运动，以成立日本的傀儡政府而将察哈尔奉送于日本。我们党，首先是河北的党，必须紧张的动员工农士兵群众来反对国民党继续的出卖，反对冯玉祥和其反动长官的投降，组织士兵的武装反抗和群众的游击战争，以为创造华北苏区开辟道路，奠下基础。

五、有力的进行反日的斗争与罢工，特别抓紧日本企业中的一切反对减工关厂、取消月赏、延长工时、武力压迫等斗争，来组织反日的罢工运动。满洲、河北、江苏的党必须加重对于中东路、抚顺、北宁路、唐山、平绥路、天津、上海等处反日斗争的领导。对于因受日本两年来进攻所遭受失业的工人与难民中的工作，也必须有计划的去进行。加紧组织工人反日义勇军的工作。

六、在国民党出卖和协助之下，满洲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我们党，首先是满洲党，应动员群众来首先破坏日本在满洲各种军事意义的建设，含有战略作用之铁路的建筑等，反对日本以武力攫取中东路的任何企图，揭破日本御用以反对苏联的“华东共和国”，在满洲军队中更须加强拥护苏联的宣传与组织，驱逐白俄与反对武装白俄等。

七、必须指出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瓜分的急进，国民党的请求国联技术合作与大借款项，更加彻底完全尽其出卖整个中国的无耻与进攻对于中国革命与红军苏区的凶恶。另方指出红军苏区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伟大的胜利，更加有力证明只有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才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应该在群众中广大的宣传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加紧进行拥护红军与苏维埃的运动。

八、利用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各派最近完全暴露出来的吞没义勇军捐款的事实，动员群众组织清算捐款委员会，号召群众起来没收这些国民党和反革命派别的财产，援助义勇军与救济失业群众与难民，同时逮捕这些吞没捐款的汉奸，成立群众法庭来审判，广泛的解释、揭发国民党以及各反革命派别年来替日本瓦解和消灭义勇军的罪恶，来开展反国民党与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斗争。党应在这些斗争中同时进行开展募捐与抵货的运动。尤须反对国民党利用“航空救国”的捐款买飞机轰炸苏区的劳苦民众。

九、征收党员的运动，特别要在铁路、码头、兵工厂和士兵群众中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应为这一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的战斗任务。

十、应该动员党、团、工会的一切力量来进行“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的示威运动、飞行集会与车间会议。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宣传大纲*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一、中国苏维埃运动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开会的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建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个苏维埃革命运动创造了新的中国——真正工农民众自己的中国。而国民党——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维持着中国封建残余的统治，维持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调动着一切反动势力来进攻苏维埃区域。这是两个政权的斗争：国民党的政权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权，他宁可奉送东北四省以及整个中国北部给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出卖中国民族的利益，而且供献进攻苏联最便利的军事根据地给日本，他宁可公开的和秘密的大借外债——美国的棉麦借款，英国的钢铁借款，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飞机和兵工厂借款，出卖中国民族的许多权利……目的只在于动员军事上财政上的一切力量来进攻苏维埃区域；它是在临死的挣扎之中保护着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保护着买办和资本家的剥削利益，因此，实行极残酷的白色恐怖和屠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五十九期。

杀政策。苏维埃政权却是中国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只有它是唯一的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在苏维埃区域里已经完全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苏维埃政府已经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国民党军阀因此更加努力的包围苏区，使中国红军不能够打日本帝国主义。苏维埃政府之下，新旧军阀完全消灭，地主豪绅和资本家已经完全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工人、农民、兵士、贫民以及一切非剥削者的劳动人民却享有一切政治上的真正自由和权利；一切民族之间的、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完全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为着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是要把中国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是要消灭一切种种封建残余的势力，首先就是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是要开辟真正经济上文化上的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苏维埃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才能够挽救中国的灭亡和瓜分，才能够避免中国几千百万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剥削和屠杀之下的死亡，才能够挽回中国经济上的总崩溃。

二、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的两年，更加表现了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运动的强固的力量。国民党军阀用十倍的兵力，几十倍精巧的现代武器，想来消灭苏区，而结果是相反——他们四次的“围剿”都被苏维埃区域的工农民众和红军打破了。苏维埃区域虽然也受了一些损失（鄂豫皖区和洪湖区），但是，苏维埃运动在全国的范围里反而更加扩大了，苏维埃的中央更加巩固和坚强了。这种胜利的发展就在于全国民众的拥护，广大的几千万的苏区工农自动的“退还公债票”——他们买了公债之后不要苏维埃政府偿还，他们自动的借粮食给红军，妇女和儿童都非常热烈的慰劳红军大批的积极的加入红军……而白色区域里的工人和民众拒绝运输白军，反对进攻苏区，国民党军队里的兵士群众一批一批的转变到红军

里去。这些，都表示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国民党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更无耻更公开的出卖中国，以至于恭请国际帝国主义来共管的政策，空前的白色恐怖和压榨，人造的巨大灾荒和失业破产等等，已经很难支持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了。另一方面，这表示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能够正确的指导广大的中国劳动民众，指导工农的阶级斗争和红军的战斗，所以使得几千百万的穷困破产饥饿的群众得到自己的斗争和解放的正确道路——苏维埃的革命。中国的民众只有向着这个目标发展自己的革命斗争，才能够取得真正的解放。今年十二月十一日要召集中国苏维埃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是检阅全国真正革命势力与总结两年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的大会，他将动员全国更广大的群众积极的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来奋斗。必须使全国各种群众，工人、农民、兵士、贫民、革命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等等，深刻的了解苏维埃革命的意义和现在苏维埃区域的状况。

三、国民党统治之下，工人群众受着极端严重的压迫和剥削，大批工人失业，只能够挨饿、挨冻、讨饭……而在苏维埃区域里，已经实行了苏维埃政府的劳动法：成年工人每天八小时工作，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年工人六小时，十四到十六岁童工四小时，工人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求知识、休息、娱乐；女工有特别的保护，例如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而工资照给等等。每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都由劳动人民委员会规定，而且每半年检定一次，使得工人所得的工资至少可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失业工人以及受伤、生病、衰老的工人可以得到相当的津贴，——这种社会保险费用不着工人在自己的工资之中储蓄（而且禁止资本家借口储蓄制度而克扣工资），这种费用都由资本家负担，或者由国立企业特别支出；此外，工厂作坊的设备

必须合于卫生，免除危险，这种设备都要经过苏维埃政府的劳动人民委员会检查批准，否则不准资本家开厂等等（参看“劳动法”）。赤色的职工会享有绝对的自由和代表工人的合法权利，工人群众的言论、出版、罢工、集会、结社都有绝对的自由。工会和工人能够充分自由的监督资本家执行这个劳动法，和资本家订立雇用各种条件——集体的劳动合同。对于工人的这些权利，苏维埃政府是绝对保障的。苦力、雇农和手工工人也受到同样的保障。

四、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农民群众受尽地主、军阀、官僚、高利贷、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剥削者的政府不顾农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水灾、旱灾、蝗虫、瘟疫特别来得多，现在使得至少一万万以上的人都变成了灾民，活活的要饿死。而在苏维埃区域里，农民群众赶走了地主分配了田地，贫农和雇农尽先分得土地，中农自己愿意也可以和贫农群众共同分配田地。凡是以前出租的田地完全没收，所以不但一切地主的田地都没收了，就是富农的田地也要没收。而富农自己耕种的，仍旧可以分得较坏的田地。这样，一切耕种田地的农民群众都可以分到田地（据有些区域的统计，大抵每人八担田到十五担田）。以前要交纳的田租，现在不要交了，而军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和田赋正项等等，也完全取消了。苏维埃区域的农民只要交纳一种极少的农业税，按照每人的收入，用累进的原则征收。以前的高利贷的本利也完全取消，以后的借贷规定月利一分为最高利率。农民群众的经济就改良得多了，地主消灭了，富农的剥削受了限制了。同时，苏维埃政府帮助农民集中耕具、耕牛，改良种子、肥料，储蓄粮食，修理道路，兴办水利……尽可能的防止天灾。农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着巩固的保障。

五、国民党统治之下，兵士的生活是极端的困苦，而且要在军阀混战之中做炮灰，要被强迫的去打红军，而同时被禁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而苏维埃区域之中，红军的兵士——就是工人农民的武装——他们享有着苏维埃政府和民众的优待。红军兵士的生活完全有保障，待遇上和指挥者——红军的团长、师长等等完全平等。而且，红军兵士在前敌作战，他们在乡下仍旧可以分到田地——由本村本乡的农民帮助他们的家属耕种。家属不在苏区的红兵——例如从白军转变过去的兵士——一样可以享受分田的利益。苏维埃区域的乡下，每一乡区都特别留下“红军公田”，由当地的农民群众代替耕种，而收入拨归这些红军兵士。如果这些“外籍”红兵退伍之后，他们就可以在“公田”之中分到自己的一份田地。最重要的是，红军兵士的作战是为着工农民众自己，为着自己的解放，为着改造整个社会。因此，红军和白军完全不同：在红军的队伍里，不但没有种种愚民政策，而且竭力发展文化工作，使每个红兵都可以得到新的知识，成为自觉的革命的战士。

六、最主要的分别，就是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苏维埃是工农民众的政权。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自己做了政府的主人，然后这些保护工农的法律才有具体的实现的力量，然后军队才成为真正保护工农兵士自己的军队，苏维埃就是工农兵士贫民自己的代表会议，这种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自然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决定并且实行保护工农兵士的法令，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女性等等。同时，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却不能够派出代表参加这种会议，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被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这才是真正彻底的民主制，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因为只有剥夺一切剥削者的参政权，才能够

保障政府机关不受他们的支配，而成为消灭地主阶级，限制资产阶级的剥削的政府，这是工农的革命民主专政。凡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动派别都受苏维埃政府的严厉的制裁。现在苏维埃区域已经建立了有系统的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和各级裁判部、劳动法庭等等。地主敢于私自收租，或者资本家敢于破坏劳动法等等，那末，苏维埃的法院立刻就会制裁他们，尤其是对于反革命的阴谋——就是反对多数工农利益的阴谋，有极严格的刑罚。

一般劳动人民以及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小贩、小商人等等——只要不是靠着剥削别人劳动生活的，只要不参加反革命的活动，——那末，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他们的一般利益，都受苏维埃法律的保障。苏维埃区域的司法采取陪审制度，就是由当地的工农选举代表参加审判，一切罪状的成立都要经过严密的审查证据和多数陪审员的判断。此外，苏维埃区域里，已经建立了民警制度，由当地的工农民众自己编练民警队，维持日常秩序和公众的安宁，制止反动派收买利用的流氓的捣乱等等。

苏维埃区域的主人是工农民众自己，苏维埃的政府职员都是工农民众选出来的，或是各级执行委员会雇用的。苏维埃的代表如果不能够代表群众的意思，那末，选举人立刻可以撤换他们。而且有经常的控告局，任何一个人民都可以控告苏维埃政府的职员，而得到迅速的解决。

七、苏维埃区域已经在战争的艰苦的条件之中，开始了文化的建设。极大多数工农民众的儿童，以前是没有可能识字、读书、求得学问的。现在的苏区里却到处开办很多的小学校，贫苦人民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学，并且还开办了许多成年人的识字班、夜学校、俱乐部。苏维埃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

奖励学术文化的发展，提倡科学、医学等等，用宣传和劝告的方法，破除迷信和宗教的成见。教育和文化政策的目的是不是像军阀国民党似的造成一些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驯服的奴隶，以及个人的升官或者发财的资格，而是要使大多数人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成为肃清一切旧社会的残余的战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战士。凡是愿意为着民众服务，愿意为着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的知识分子、各种专家、技师等等，都受着苏维埃政府的优待。

八、自然，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在国民党军阀的轰炸和屠杀之下，还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建设的工作，然而尽可能的，苏维埃政府已经在发展民众的经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同样是为着工农阶级的利益而限制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区域里，邮政、公路、桥梁等等的建设已经有相当的进行。苏维埃政府领导着民众实行储蓄粮食，而创办粮食合作社；没收地主的耕具和牲口，没收富农多余的耕牛犁耙，组织“犁牛站”使贫苦的群众可以大家来借用；还竭力奖励耕种工具和其他工具的制造。苏维埃政府领导民众组织各种消费的和生产的合作社；实行大规模的春耕夏耕运动和秋收运动，奖励粮食生产的提高。就是私人资本家的生产事业，例如造纸厂、瓷器厂等等，只要资本家完全服从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也给他们一切必要的帮助。如果资本家抵制苏维埃政府，或是逃走，或是故意怠工破坏，那末，苏维埃政府就没收他们的企业，由苏维埃国家来经营。苏维埃政府创办了自己的银行、信用合作社——借贷款项给贫苦的农民，而且统一了货币。

苏维埃政府之下，除出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外，就只有一种累进的工商营业税。贫苦的农民、工人以及小商人，在一定数量的收入之下，一概免税，而一般的纳税人也完全不要交付

像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各种各样的税捐。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确定的预算决算制度，每一个地方每一年度的支出和预算，都要经过当地工农兵会议（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通过。

九、总之，苏维埃革命是真正民众自己的政权的建立，是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现在的苏维埃区域里的情形就证明了这些任务已经在彻底的实行着。工农兵士贫民的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良，他们已经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是在开始创造新的中国。这还并不是社会主义。这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商品生产还并没有消灭，然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必然要开辟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广大的工农劳动民众只有在这个前途之中，才能够得到最后的完全的解放。

十、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已经有广大的领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湖北、安徽、四川、陕西等省的许多县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尽力的进行着。这是长期艰苦的斗争——这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斗，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的民族革命战争。为着真正的解放的战斗，是不能够没有牺牲的。苏维埃区域的多数群众都了解这种牺牲的意义，因为幻想着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立刻就是天堂，就可以坐着享福，那只会使反动派乘机反攻，而丧失工农已经得到的胜利。所以苏维埃区域里的劳苦群众都积极的拥护苏维埃政权，自愿的加入红军——使得工农红军迅速的扩大，自愿的借出粮食，推销苏维埃公债，集中一切力量、知识、技能、经费……来为着扩大苏维埃区域而斗争，要在最近期间，把分散在各省的苏维埃区域联成一片，夺取更大的城市，完成一省几省的首要胜利。

这种胜利的前途就是国民党——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末日

的接近。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帮口和派别，现在用种种残酷的手段对苏维埃与红军实行第五次的“围剿”，轰炸、屠杀、封锁……他们想用饥饿、死亡、烧杀的政策企图来扑灭苏维埃革命。他们自己这样制造着“匪区”里的灾祸，他们却又造谣，说“共匪杀人放火”，说“共匪毁灭生产”，造作千奇百怪的谣言来诬蔑苏维埃区域，也就是诬蔑几千百万反抗起来的工农民众。国际帝国主义督促着，指挥着国民党军阀，借外债给他们，用大批的武装、飞机、大炮等等供给他们，使他们来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这也就是因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完全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十一、全国的工农兵士和一切劳动民众都应当派代表去参加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当赞助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拥护苏维埃和红军——揭穿国民党等的造谣诬蔑，拒绝运输白军，反对五次“围剿”，反对一切“剿匪捐”，反对借外债来屠杀中国民众，帮助红军的作战，转变到红军队伍里去。而且一切工农民众为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为着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军队，为着解放自己，为着改良自己的生活，为着社会主义的前途，都应当争取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会议的政权。而全国的地主豪绅买办资本家都在帮助国民党的军阀官僚进攻红军苏维埃，也就天天的压迫和剥削民众。因此，只有发展工农的阶级斗争，发展兵士群众直接反抗军阀的斗争，发展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发展民众自动武装实行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才是拥护苏维埃政权——庆祝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大会的行动。拥护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发展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全国斗争，创造新的苏区，必须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瓜分、共管的斗争联系起来，必须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

进攻苏联的运动联系起来，尤其必须和各种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

（关于苏维埃区域的材料，在宣传的时候，必要应用《苏维埃中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优待红军条件》、《对日宣战通电》——都见去年出版的《新中国》）。

中央宣传部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 中央对目前形势和军事部署的指示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周：

沪来电转如下：

(一) 由于你们最近战胜了十九路军与广东军队的一些部队，我们今后继续执行计划的一般条件是更加顺利了。不过对于这些胜利结果，付了太高的代价，因此应该得到以下的教训：不要过于费力企图夺取城市和堡垒，应将这种企图当着次要的目的；主要的应该威胁城市，诱引敌增援，以便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

(二) 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以下的步骤：

甲、八月间我们在福建的中部，至少应该消灭敌人的两师，以便在五次“围剿”开始时，即破坏协同的计划。

乙、我们必须在协同围攻开始，布置强大的胜利的部队达到邵武区域，以便后来逼敌人于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央军消灭西方某些部队之机会，同时东方军应与（七）^{〔1〕}一军团完成合作以后，更应与兴国红军合作，共同消灭东方的敌人部队。在第二阶段中的作战，主要的注意力是在东北方。因此在九月前，为着对付五次“围剿”我们对于整个兵力的分配，有

以下的理由提议：从我们全部的兵力中，东方军应占百分之四十，中央军应占百分之三十，东南与南方战线合起来，应占百分之十至十五，中东路区域的后备队应各占十五至二十。

（三）为着便利于东方军，在八月间在福建中部的行动，我提议调五军团的一师到建宁、太宁的方面去，以便与三军团合作进攻将乐和顺昌，使敌人在八月二十左右，□觉察到这些作战的影响，而便利于三军团行动。

（四）东方军团的战斗员在八月应达到二万人，不要继续大规模的行动，反对广东军和十九路军应在八月间即集合那里的力量，并使之集中于积极的游击队的□，以便当敌人企图继续进犯苏区时，给一勇猛的对敌。

（五）必须准备着防御敌人的飞机轰炸中区，我们预料南京在开始进攻以前，将开始轰炸，应严重的注意各方敌人的行动，及受训练的敌人军官团之行动。因为这些军官回去，就是表示敌人将在一周或两周后开始“围剿”的象征。

（六）因为我们没有详细的地图，请你们在电报中务必告过分小的地方距某个大的地方有多少米远，并在什么方向。

（七）我们采取在十九路军的士兵中作广大的政治运动，号召他们不要再打工农红军。若他们指出初次我们愿意不再打，他们与我们一起不打，匪的□□国与日本的南京政府蒋介石^[2]，保卫福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告诉他们，日本已在厦门组织匪徒，准备在□侵略福建，特别应在东方军的活动区域广泛的散发传单标语。

中 央 局

十日

注 释

〔1〕原文如此。

〔2〕原文如此。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 中央对作战步骤的指示给朱德、 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朱、周：

沪来电转下：

一、因为不久以前，你们报告我们占领丰城，所以我们提议夺取吉水，现在条件概已改变，新的敌人力量已向赣江移驻，我们并不坚持这一意见，不过着重指出：应在赣江附近、乌江以南创造根据地，并在新淦、峡江与永丰之间，布置强有力的游击前哨。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就是要扰乱敌人的羽翼，不让他安然改编，而使我军在敌人没有开始进攻以前，可以相安无事。

二、三军团由于炎热的天候与缺乏粮食，而致削弱，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下的步骤：

甲、仅以二十三师与模范团执行你们反对广东军队的计划，然而这些力量，直至八月半，还不得手。我们提议停止反对广东的较大行动，而以游击军队集中在会昌东南和西南，在于都并应有我五军团之一都，以便准备着：广东军队如向北进攻时，给他一个反攻，在这时应即放弃收复安远及其他失地的计划。因为在同一时间，我们不能举行两个进攻的，反对北方敌人，又反对广东。

乙、在八月上半月，如广东不积极进攻，我们可以从南方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来帮助东方军团。

丙、如若闽南的条件允许时，我们应企图逐渐将东南反对十九路军的战线安静下来，以便集合我们的力量，小心的准备，如我们对付广东的敌人一样。如是尽可能的使我们的力量，挤开南方的敌人，着三十四师，仍应继续钳制连城的敌人。

丁、三军团在目前的条件下，应开始向北，到达将乐行动，应采夜间的轻便行军，与敌较大的冲突应该避免危险于我们的行动，使给养及粮食没有较大的关系，不要占领任何城市。我们在移动时分成两纵队，以从将乐的东方和西方，同时渡河，当我们纵队还没有取得河之北岸区域。与第三军团没有从西方来援的时候，我们同时进攻将乐的警卫队，同时渡河，必须对延平的方向掩护。

戊、从现在起，最大的注意应该集中在转入计划中第二阶段的实力。为达到此目的，三军团必须加强起来，七军团应开到将乐与三军团配合行动，十九师及其他新编部队，如新模范团，应立刻编入三军团，在八月半以后，训练的力量亦应编入三军团。

己、五军团的主力应留在雩都、兴国的区域。作为南和北方战线之准备军，现在还没有必要详细告诉你们。第二阶段开始时作战的布置，根据三军团向北移动的结果，与整个东方军团从各方面加强的情形，你们可以比现在更大的作出战争的规模。现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应该能及时的电告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使东方军移向将乐、顺昌、邵武之间，集中河岸以北，并在八月中得到配合。沙县、清流、旧化，应在三军团以外，调动其他的部队驻守，例如少共国际师。如果由于时间

短促不可能，可暂时的由三十四师的一部驻守。

三、告诉我们三军团实际损失的情形，友军反对十九路军与广东敌人的我军情况。

中 央 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 中央对行动部署及任务的指示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周：

沪电转如下：

(一) 我们同意你们在赣东北方面的部署，这些部署其目的就在：

甲、以独立二十师与二十一师，掩护东方军的外翼，同时钳制资溪以东的敌人。七十九师、五十五师、四师及二十一师，给我十军以直接的援助。在独立二十与二十一师到达崇安、蒲城区域以后，并可以小的队伍，如闽北独立团，向崇南袭击，钳制建瓯的敌人，并与政和的土匪取得联络。

乙、在我们所希望的顺昌、将乐取得以后，东方军在上述独立团与二十一师掩护之下，即应率领三四个师，转向邵武、光泽、资溪，而只以小部队，如六师、十五师、二十师，即应从黎川以西的区域，向金溪进发。他们应在东方纵队开拔的数日后开始行动，无论如何不要因取得了邵武延迟了这两个队伍消灭敌人五六两师的共同任务。我们西方的黎川方面的部队，必须制止敌人渡过抚西逃跑的企图，同时截击南丰、南城方面来的敌人。而东方的部队的任务则在南丰敌人阻止金溪谋北退去。要知道在黎川、资、金溪的区域，没有完全肃清敌人以

前，我们以后的行动将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这一任务，应在九月的三个礼拜以内完成。估计到敌人的进攻，加速我们的步骤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二) 在下面我们要说到第三阶段中我们多少可能的行动，作为初步的意见，请你估计到军委与相当的军事指挥者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告诉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

我们想在我们消灭了五六两师及八师敌人派遣的新的力量，肃清了黎川、资溪、金溪区域，与掩护的部队一起扩大了我们的活动到东乡、进贤，并钳制了敌人七十九师、四师、五十五师、二十一师于邈远的东方及东北方，以引我们将进至我们的主要作战的下一步骤。现将我们对这一步骤的意见，写在下面：

甲、东方军团与中央军的联合行动，来进攻南城、宜黄之间的敌人，其目的即在：

乙、使东方军团易于渡过抚河以西。

丙、消灭南城、宜黄、抚州三角区域的敌人实力。

丁、击破南城与宜黄之间的堡垒区域的敌人左翼。

戊、仗我们的力量，稳固的驾驭抚河，以便根据形势，继续以后作战，去依照敌人进攻的阶段，来决定我们到西北去，还是到西南去。

(三) 为达这一目的，必须：

甲、东方军不仅向抚州威胁，同时准备率领四五个师，在抚州、南城之间浒湾、东馆等处过河。其目的即在突然的向宜黄方面的敌人六十七师、十一师及凤岗九师进攻。东方军在抚河以西突然出现，将很大的帮助中央军的行动。

乙、中央军在永乐行动，威胁乐安、宜黄，移至东方以后，即应在宜黄区等待东方军所选择的过河时机。在这里一军团既能按时的离开了敌人，中央军即应留下十四师及一切独立

团，与宜黄的敌人作战。以第一军团然后由南方向南城进攻，东方军与中央军的作战尊重时间，以便在行动中从相对的方向会合，执行共同的任务。首先消灭南城、宜黄区域的敌人实力，其后占领南城、宜黄的堡垒。如若我们不能在突然的进攻中取得南城，则在消灭宜黄区域的敌人实力以后，必须取得他。因为占领南城，对于我们以后的行动是很重要的。

丙、我十四师与一切独立团的作战，亦应与上述的行动配合起来。他们应在乐安、宜黄之间行动，反对敌人的九十七师、九师与四十三师，主要的应从西南方面攻击宜黄。

丁、第三师在按日的移到北方以后，即应经过南丰之西开向南城，以便与第一军团在一起作战。

戊、十五师应停留在广昌的西北作为后备队。

（四）无论我们能够取得南城南丰与否，我们都必须消灭这一区域内上述的敌人十师，以便在抚河敌人的翼侧，保存我们的积极行动，威胁敌人的进攻。在那里如果敌人开始进攻，我们的任务亦可比从前更加容易，因为敌人实力的进攻，均在堡垒区域的外面，同时切断敌人的后方，与西南的堡量区域的联系，亦就大大影响敌人的进攻，使他一切侵入苏区的企图，成为不可能。恢复浒湾到南城以至更向南这一段抚河，必须留我们的力量，巩固的驾驭着。如若我们能够取得这一地位，则在任务需要的时候，都可向任何方向行动，当南城周围的半个圆圈，即从北方的浒湾，南方的南丰以至西方宜黄、乐、崇的水道，都在我们的手里的时候，我们以后便不怕河道在我们的后方了。不过有两个问题，必须预先回答的：

甲、在今年该时渡过抚河，在技术上是否可能？

乙、我们威胁和掩护的部队，能否驱逐从抚州来的炮舰？很明显的，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应早在游击等行动以前完

成，而行动本身，则须带突然的性质。

（五）为着阻止敌人的准备，你们应命令十六军从西北进行扰乱南昌区域的特殊任务。

中 央 局

十 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展开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瞭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

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进出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最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

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问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础。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

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自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

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

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才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通知^{*}

——关于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各级党部：

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在江西中央苏区举行。苏维埃政府已发出通知书，邀请全中国的群众选派代表出席大会。我们的任务是发动宣传鼓动工作，准备选举与派送代表至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必须立刻开始进行下列工作：

一、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群众工作和群众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之上选派出席大会的群众代表。

(一) 首先要在各大产业中心选派产业工人代表。这里，江苏、河北、武汉和满洲的党、工会、团必须最广泛的发动群众工作以保证代表之圆满的产生。各厂代表选出后，须组织许多整齐的代表团，由代表团再选主席或首席代表一人，并以代表团的名义及经过代表推进各城市各厂的政治鼓动工作。

(二) 在各主要农村里，召集农民大会，选举农民灾民代表，并应保证贫农中农及雇农的成分，及保证在农民代表团中之雇农和贫农的领导作用，努力达到经过这些农民代表在各乡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一期。

村成立农民委员会和各种拥护红军的群众的组织。

在白区的各游击区域里，尤应加紧这一政治鼓动工作，选送英勇的游击队员和抗捐军到苏区出席大会。

（三）在政府军队士兵、义勇军部队、各学校及文化界亦应选出代表，以推广苏维埃的影响。

选举代表的运动，应该广泛的进行，但各地党部应该按照规定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名额（另有通知），进行复选运动，不出席参加大会的代表，仍应在群众中继续其苏大会运动的工作。

（四）如有可能，在每一代表团内，必须成立党团以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尽量的利用选出来的代表，经过他们在各地各工厂学校及各部队中成立“红军之友”等群众组织。各代表必须经过群众大会选举，不准委派，代表的川资必须发动群众的同情募捐。邻近苏区的各白区的党尤应加强这一工作，以促进苏区之扩大。各地代表须于十月十日以前选就，俟接到专门通知时即行出发。

二、在第二次大会的周围团结全中国的民众须要开展极广泛而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

（一）必须根据中央政府的宣言和宣传大纲及其他材料对准各地的特殊任务，制定群众大会的报告大纲，翻印“第一次大会到第二次大会”的小册子，刊行各种通俗小品、画报、苏维埃区域地图及各种统计表，并限即日起各级党刊及其他刊物须全部转载中央《斗争》上的红军捷报与苏区通讯，召集各种群众会议。

（二）各级党部宣委须立即组织各种宣传队、标语队、散发队，以进行关于第二次大会之一切宣传事宜。

（三）在各地、各工厂、各学校须努力争取公开的活动以

动员群众来成立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分会（总筹备会在中央苏区业已成立）。

（四）在各种群众大会上须达到通过拥护红军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与通电，由各筹备分会之通讯组及时发出，以资号召。在各级刊物上须另辟专栏登载各地筹备第二次大会的消息。

（五）向上海反帝组织提议，在各种名义之下组织展览会、游艺会，以扩大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宣传，其他各地，如有可能时，亦须组织。

（六）向上海及北平等处之文委党团提议，动员左翼作家创作关于中国苏维埃之文学的艺术作品并保证广泛的散布。

三、冲破敌人的五次“围剿”是准备第二次苏全大会的中心任务。

四次“围剿”已经被英勇的工农红军和劳苦群众胜利的冲破。蒋介石国民党以帝国主义共管中国为代价，举行大借款，充实军备，以乘“秋高马肥”之际，举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我们党必须全体动员起来，组织白区的工农士兵群众来反抗第五次“围剿”。必须进行下列工作：

（一）加强白军士兵中的工作，特别要用一切方法打入直接进行“围剿”的部队中去，发动士兵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以至组织革命的兵变，这对于邻近苏区之白区的党尤负有特别的责任。

（二）在发动农民群众日常斗争基础之上，首先在赤白交界的区域里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以钳制敌人，协助红军而促进扩大苏区的任务之完成。

（三）加强兵工厂、铁路、水道运输工人中的工作，特别要建立上海码头的工作，以破坏和没收入口的军火来武装工

人。江苏党团海上区委和工联之码头工作委员会必须共同商量这一工作之进行的具体步骤，即日开始工作。

（四）五月份内，中央苏区红军新扩充了四个模范师，更于“八一”日正式成立了两个工人师及一“少共国际”师，应该在扩大红军的周围加紧武装白区工农群众的宣传与工作，动员产业工人到红军中去，和扩大募捐帮助红军的运动。

向少共中央局提议，检查河北团省委所发起的“河北青年”号飞机募捐运动。

（五）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行有组织的饥饿和经济封锁政策来进攻苏区，必须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的饥饿政策，组织同情的援助。在邻近苏区的白区的党必须组织群众捣毁国民党创办的油盐公卖所等封锁机关，组织边区民众武装输送队等以破坏敌人的毒计。

四、第二次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须与准备广暴六周年纪念的工作完全联串起来。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中共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央 关于目前形势和行动的几点意见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周：

沪电转如下：

(一) 你们最近的电报，表示我们双方对于形势的了解，是没有分歧的。不过有几点必须提起你们注意，特别因为目前正在更顺利的条件，我们必须看在第二与第三阶段中的某些变迁，粉碎十九路军的左翼与停止广东军队右翼的进攻，给我们一种机会，能将我们的力量最大限度的转移到北方去。

(二) 北方敌人在赣江的右翼已有八师左右的力量，同时敌人大概还要从吉安方面集中抚河以西的敌人的中路，亦已有了新的集中。由此就可以得到结论：我们在敌人还没有开始进攻以前，必须扑灭目前较弱的敌人左翼，这一任务到九月半必须完成。只有这样，我们那时才能居于有利地位，停止敌人中路与右翼逐步企图。

(三) 因此我们提议以下的初步步骤：

甲，在福建西南方，不要有较大的行动。在武平、上杭、龙岩的行动方针只发展游击的活动，正式的军队如三十四师，应集中在后方，准备即迅速的及时的回答敌人任何的行动。这

里主要的目的，并不是防卫已经得到区域，而是继续不断的扰乱敌人的实力。如若在这种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放弃连城时，也不要抽调任何新的军队来恢复它。

乙，对付广东敌人的策略，也是一样的，特别应在寻乌、安远一带发展游击使敌人疲于奔命。而使二十二师集中于右翼之后面，即□信丰之东北。

丙，驻于汀州、会昌的工人师，应暂时的作为三十四师与二十二师的后备军。

丁，其他一切的部队，特别是模范师，应该准备着加强我们在北方的力量。我们想在九月初能调动新的力量到清流区域，并要那里少共国际师会合起来，再向北移。那我们到九月半，即将有需两个新的强有力的师，作为东方军或中央军最亲近的后备队，至于归化清流的警卫任务。在九月初，我们即应委托某些独立团的队伍来担负。

戊，我们□□东方军，即三军团与十九师，业已首途北上，独立二十师、二十一师亦已在其右翼继续向沙县、延平掩护。我们任务就在八月以内，与兴国的力量合作，消灭将乐、顺昌警卫军队。引至郊外，那将更易于击败他们。独二十、二十一师应继续向延平，并其东方袭击，以掩护东方军的翼侧。如我们要得到充分的时间，在敌人大举进攻以前，扑灭他们的左翼。上述的一切行动，至迟在九月初必须完成。

（四）甲，九月初或者完结第二阶段的行动，应该是由东方军迅速消灭邵武的独立第四旅，并在九月半将一切增加的力量，集中在邵武、光泽、资溪区域。

乙，独立二十与二十一师，在光泽、崇安、贵溪的三角区域以积极的游击战争，掩护东方军的右翼，完成了这种任务，我们认为第二阶段即告完结。

丙，同时当东方军取得邵武的时候，中央军应尽力使蒋^[1]敌的中右翼疲于奔命，扰乱他进攻的准备，最后在第二阶段的末尾应留下小的力量，如五军团钳制永丰、吉水区域的敌人，以便所有中央军的其他力量，都能移至宜黄区域附近。抚河准备第三阶段与东方军联合行动。

（五）由于敌人右翼形势的变化，使我们必须改变中央军原来的企图，我们在第三阶段中，应有以下的改变：

甲，独立二十与二十一师，应继续向东北活动，直至信江。

乙，东方军打击与消灭了敌第五与第六师以后，即应不迟延的越过金溪向东乡进贤区域，先头部队所至应尽速的达到进贤。

丙，根据威胁金溪事实及敌人中路的行动，即可决定第一军迅速移至抚河的以东的地点与时间，以便尽速的完成消灭敌人的左翼。

（六）此后我们在第三阶段中的目标根据以上的改变，仍旧是抚河。不过进攻抚州的先决条件，是要完全毁灭敌人左翼的实力。现在仔细的计划进攻抚河的道路与第三阶段的行程未免过早。不过在九月间，敌人的左翼既经扑灭，即或他的中路和右翼能开始进攻，亦将失去效力，同时使敌不得不重新改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在十月间消灭敌人四五师的目的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我们即可在别的方面，开始我们的进攻，使我们大部分力量，尤其在北方在西南给敌人新的在冬季进行新的作战。我们想目前应该指出：冬季作战前以便你们在将来行动的区域中，开始准备工作，例如派遣秘密的宣传队与游击队伍等等。各季的作战，将来开始向信丰、赣江方面的粤敌左翼进攻，以便取得赣江的左岸，援

助我第八军的扩充，并开辟到赣南与赣西的道路。这一作战将需要三万至四万人，其余的应扼守保持苏区的任务。根据上述的冬季的作战，我们目前就应即开辟在雩都区域，创造□至一万人的新的部队，这些部队的训练应在新年开始时完成。

中 央 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光鼐。

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信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和你们断绝了交通关系将近一年，仅从报纸上和个别的捷报中，一般的知道了你们的斗争情形，曾由中央苏区转给你们一个短短的指示，许多问题，自无从谈起。这次，四川省委已与你们打通了关系，并由省委转来了昌浩^[1]同志简要的给四川省委的信，仍旧无从了解你们的全盘工作。因此，我们只提出几个个别的问题，促起你们的注意，至于整个政治的和军事的指示，尚有待于你们迅速交来详细报告之后。

一、胜利的冲破四次“围剿”与第五次“围剿”中党的任务

帝国主义国民党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由于红军的英勇善战、苏区及白区中广大劳苦群众对苏维埃与红军热烈的拥护及党的正确的领导，是被我们彻底的与完全粉碎了。我们巩固了原有的阵地，并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使苏维埃的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红军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增强了自己，覆没了敌人十几师，粉碎了敌人全部计划。这一伟大胜利，更加尖锐化了全中国的革命形势。

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在二三

月间国民党军队在黄陂东陂的惨败后结束了。东黄陂惨败后，蒋曾几次企图根据原有的力量，不变更四次“围剿”的总计划，向我们作新的进攻，但这一切企图都失败了。蒋介石不能不暂时改变积极进攻为防守政策，调遣新的军队，组织新的力量，以较长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

四次“围剿”的冲破，指示给全中国的劳苦群众，苏维埃革命有强固与不可消灭的力量，一切企图以武装进攻或经济封锁来阻止或消灭苏维埃运动，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惨败。同时在冲破四次“围剿”中，我们还有许多异常重大的弱点，主要的是未能将白区中反帝斗争及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更大开展与红军胜利的配合起来，军事上未能建立全国集中的军事领导来配合各地进行战斗任务，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非常不够，战略与战术的活泼性很差，红军的组织还赶不上战斗开展之需要。这许多工作中的弱点，妨害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之实现。

在中国前面放着两条绝对不同的道路：或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或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帝国主义正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完全瓜分中国以沦于完全殖民地化的计划。在这整个计划之中，五次“围剿”是不可分离的重要的一步。四次“围剿”粉碎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即刻开始新的五次“围剿”的准备：签订了出卖东北四省与华北的“塘沽停战协定”，便抽调劲旅南下“剿共”；南京政府经过宋子文向英美帝国主义者大借款，购买大批飞机大炮；法西斯蒂的德国且专为国民党兴办了两个兵工厂，制造屠杀中国劳苦群众的武器；近且向日本直接乞援；大批法西斯蒂干部培养与调赣参加“围剿”；发行大批“航空公路”公债，剥削民众的血汗以充实“剿赤”的军费；拟定三年军事建设计划，开始召募与训练五十万完全法

西斯蒂化的军队，五千架战斗机与两千辆坦克车等，以大规模进行反革命的战争；同时召集新的五省“剿匪”会议和对苏区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重新确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帝国主义的作用更加强了，成立了共管中国的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步骤。因此，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更进一步的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都是一天天削弱，国民党统治的走近崩溃，更加使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

中央认为全党应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下列的紧急战斗任务。

(一) 苏区的党的组织：

(1) 必须立即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领土及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等口号的周围，号召与动员全苏区的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

(2) 继续猛烈的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团，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扩大与加强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政治的训练，以实际准备过渡到义务兵制的步骤。

(3) 极大的注意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4) 红军各部间须在整个的战争意志下进行战斗的任务。

(5) 加强与改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组织与援助白区

的群众斗争，开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开展查田运动，巩固与中农联盟，领导工人经济斗争，加强工人阶级对苏维埃与红军的领导。

（6）在胜利的冲破五次“围剿”的口号下，来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

（7）为保障红军的给养与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开展合作社运动、秋收与粮食收集储藏的运动。

（8）党必须加强附近苏区的白区中的工作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大的中心城市及工人集中的区域中去。

（二）在国民党区域中的党的组织：

（1）必须立即进行反帝反国民党的新的煽动，号召并组织反对进攻苏区的示威、抗议、罢工与群众会议，尤须加强在码头和运输工人中的工作。

（2）开展与加强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执行中央最近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信，注意争取我们对于满洲、河北及其他各地的游击运动的领导，使他们走向创造新苏区的道路，及在广大群众中普遍中国民众与苏联之兄弟联盟的口号，加强拥护苏联的工作。

（3）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广大的群众工作，组织无产阶级的反攻。

（4）领导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灾民、难民、兵士的日常斗争，并引导到走向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

同志们！中国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火焰中。在完成这些任务中，你们光荣英勇的红四军实负有重大的使命。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将加多整个革命战争胜利的机会。

二、目前四川的形势与红四军及四川党 在冲破五次“围剿”中的具体任务

目前四川的形势，对于开展四川的苏维埃运动是非常顺利的，你们应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的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的西北。这一顺利的形势决定于：

（一）红四军的伟大胜利与川陕边苏区的扩大。据《申报》所载，谓红四军已增至十万人以上，而昌浩报告，则谓苏区现已包括通、南、巴、广、万、绥、营、宣、阆、苍、宁、城、西、镇共川陕十四县，通、南、巴全为苏区。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下了最坚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区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

（二）红四军入川后，更加兴奋了四川劳苦群众的斗争，抗捐抗税的斗争在许多地方演成了武装战斗的形势，树立起声势壮大的抗捐军和川中及川滇边的游击战争，这是削弱敌人有利于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最有利的条件。

（三）四川各系军阀间的冲突，又一次酿成了全川的军阀战争。刘文辉固然败退岷江西岸，或更被迫退入康边，但刘湘所领导之下的联军亦已创伤不小。而四川的统一，除我们以革命战争来完成外，对任何一个军阀都将是梦想。联军内部的冲突依旧是存在，防区割据的制度并不会就能消灭，这将继续牵制各派军阀，彼此削弱自己的力量。

自然，对于这一个基本上顺利的客观形势的分析，并不能使我们因此可以忽略四川整个形势之其他各方面。这一种忽视会造成你们自骄自满，过于看低敌人的力量，以松懈我们的工作和动员，而重复你们在鄂豫皖苏区曾经犯过的轻敌而使鄂豫

皖苏区遭受部分失败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中央同时要求你们严重的看到下面的几个事实：

（1）据天津日本军事情报处报告，英公使蓝博生到四川重庆去的主要目的，是同刘湘讨论划定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和这两处贸易的可能，并且谈判二千万的英国大借款用以购买飞机、军火和其他商品。同时法国总领事梅礼霭也曾到过重庆，进行怎样把法国势力更深入到四川而巩固起来。这些事实，使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都不得不认为：“……四川军阀……接受新的借款，英国人就不但得以统治西藏而且可以统治四川了。此外，联合进剿四川东北边境红军的事实，也很有可能性”。

红四军的伟大胜利与四川革命运动的壮大，使得四川的统治阶级更直接的乞援于帝国主义，而且使帝国主义者自己也感觉到他们在西北统治的致命威胁。英国之实际占有西藏与向东进展，实在积极准备着就近的军事根据地，以企图直接武装干涉四川的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法帝国主义者虽与英有利害的冲突，但在压迫苏维埃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你们应当看到这种逼近的危险，来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2）最近四川军阀战争以刘文辉之惨败渐趋结束，而刘湘等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积极督促与帮助之下，对你们大举进攻的危险更加紧张，并将首先驱使四川较小的军阀为“剿赤”的前锋，以消磨我们的力量，而造成他的“优势”。南京政府蒋介石将更多依重刘湘，资助他来与我们为敌，你们决不应该轻视这一个反动武装所给与我们的困难与威胁。

（3）四川党的薄弱，没有很好的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还没有普遍的开展起来。这些游击队伍中，有的还在反动豪绅操纵之下，没有完全夺取到我们领导之下，把他们的行动汇合起

来，统一起来，很有被军阀武装暂时击败的可能。

这些事实，虽不能改变目前基本上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但要求你们很锐敏的估计到这些我们发展中的困难与障碍，并用一切力量来以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克服这些困难，才能使你们在开展你们的整个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目前的形势是给你们取得进一步胜利的极大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变成实际。自满于胜利的可能性，而不以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可能，不算是真正的革命政治家。斯达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的指示，是值得你们深刻去了解的。

根据这一形势的分析，你们的具体任务，就应该是：

（一）巩固现有的苏区与将这些苏区联合为一个不互相隔离的整体。在这里中央要求你们深刻领略你们过去轻易将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而没有为保卫苏区根据地战到最后可能的错误。你们应当了解：红军是苏区的支柱，没有红军则苏维埃政权无从树立得起；苏区是红军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红军不但将无从壮大，而且必流成散漫的游击队伍。因此，你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执行中央给与你们要在渠江与嘉陵江之间，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将现有苏区内敌人一切残余的力量完全肃清，把其他苏区都变成通、南、巴一样的整个的苏区。

（二）为巩固苏区与向前扩大，必须加强和扩大红军。中央认为你们有一切可能和必要在今年内创造真正富于战斗力的主力军五万人。这样，才使你们能打碎任何敌人的优越部队和夺取中心的城市。

（三）必须动员你们一切力量和整个的四川党来争取十数县以上的抗捐军的领导，及发动川中和川陕边及川滇边的游击

战争。报载川滇边（古宋一带）的游击队拥有四千余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务必派人去沟通关系，使他们在整个计划中行动，以配合红四军主力的作战。

（四）你们现拥有三千里以上的苏区，范围已经很广，因此使红军各部间的行动统一非常必要。

（五）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加强各级苏维埃的工作，确立正确的经济政策，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六）加紧反帝的工作，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十一日在上海开幕，你们和四川党必须动员广大群众以加强反帝工作来拥护这个大会，应加强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及到处建立反帝的群众组织，筹备召集救国御侮的代表大会等，以动员群众。

（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于今年“广暴”纪念日在中央苏区举行。你们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来拥护二苏大会。在川陕各苏区举行各级苏维埃代表会，并选举出席二苏大会的代表，务须于十月底即派来上海。

中央责成你们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加强全线上的工作，工会工作尤居首要。你们应巩固与省委的联系，即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亦不应断绝。

三、赤化四川全省的任务很迫切的摆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在执行这些任务中的每一成绩，都将增加革命势力的比重。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国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非此最后堡垒，而亦遭受‘赤祸’之蹂躏

盘踞，将来发展，宁不可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着你们，你们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

中央向你们和红军四军全体战斗员致极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中 央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昌浩。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

(一) 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破产了。国民党的统治把中国引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空前的浩劫(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陷于饥饿、失业、破产、贫困的深渊中)。帝国主义公开瓜分中国，造成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使中国走向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罢工运动空前的高涨，反帝斗争蓬勃的生长，农民运动普遍发展，特别是红军与苏维埃的伟大的胜利——这些都表示出中国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与剧烈化。中国革命剧烈的发展，形成了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在中国面前摆着两条绝对相反的道路：一条是殖民地化的国民党道路，一条是自由解放独立统一的苏维埃道路。

国民党的破产，使得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它曾经企图采用各种新的欺骗手段，以继续自己的血腥统治，如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以至于无所不有的所谓“国民会议”、“国难会议”、“开放政权”等等。然而，这些企图都遭了可耻的破产。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之下，地主资产阶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出版的上海《斗争》第五十三期。

级的反动统治，只有更加崩溃。为了更凶猛的摧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为了镇压反帝反国民党的一切革命运动，为了进攻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与英勇的工农红军，以挽救地主资产阶级垂死的反动统治，于是法西斯主义便在中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新的欺骗手段，这不是表示反动统治力量之加强，而是表示它的力量之削弱。

（二）中国法西斯主义，与西欧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虽有共同之点（疯狂的白色恐怖，摧残共产主义先锋队，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它有种种特点。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的政党，那么封建残余占优势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不能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派别。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以民族主义去实行“对外政策上极端的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国际纲领”），那么成了帝国主义工具的中国反动统治的法西斯主义，却在“民族主义”的幌子之下实行出卖民族利益和替帝国主义侵略作清道夫。如果西欧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是在统一的独立国内而能采取独立的政策，那么，殖民地化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只能采取以帝国主义意志为转移的政策，适应对中国瓜分共管的政策，绝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统一。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支柱，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最反动的一部分力量上，主要的是军队、警察、民团、侦探、官僚、政客、革命叛徒和上层知识分子等等。法西斯蒂抱定一个目的“不断的进行争取士兵、团丁、警士……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的独裁政治，并不是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义，也不是德意志式的法西斯主义，乃是根据中国历史的特性而成立的武力和知识分子相结合起来的法西斯主义”（见《政治评